



北京大學

本科生毕业论文

自由主义者的蜕变
——试探格莱斯顿政府为何出兵埃及


The Shift of the Liberals:

A Study on Why the Gladstone Government Sent Troops to Egypt

姓 名:	祝艺源
学 号:	1800017407
院 系:	元培学院
专 业:	国际政治
指导教师:	梅然

二〇二二年六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评阅表

论文题目 (中文)	自由主义者的蜕变——试探格莱斯顿政府为何出兵埃及				
论文题目 (英文)	The Shift of the Liberals: A Study on Why the Gladstone Government Sent Troops to Egypt				
导师姓名	梅然	职 称	副教授	论文成绩 (百分制)	95
导师评语 (包含对论文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是否符合培养目标的等评价)	<p>本论文是研究对外政策决策的一篇学术性很强、具有明确问题意识的论文。英国在 1882 年出兵并占领埃及，是国际关系史上对国际格局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时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代表人物，该理念贬抑炮舰主义外交，倡导国际协调；其一些阁僚也有此倾向。那么，一个这样的政府为何采取似与其理念相左的政策？相关研究的解释力尚有不足，因此本文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p> <p>本文写作需要阅读和参考大量英文文献，需要评析影响英国政府决策的意识形态、物质利益、外部舆论、内阁内争执等多种内外因素，还需要解释英国政府的前后政策的动态性和矛盾性，因此是很有难度的挑战。作者很好应对了这一挑战。本文立足于现有的大量资料，较细腻论证了英国政府的自由派成员从抗拒转变为配合乃至支持动武的“心路历程”，包括自由国际主义者在对外政策实践中面临的挑战、纠结乃至“自我安慰”。主要观点以及围绕之的逻辑论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值得肯定的一些新意。论文的结构合理，文字通顺，格式规范。</p> <p>由于当事人比如格莱斯顿对该事件的自述材料有限，本文若干观点的实证有欠充分，但这是客观条件所限，瑕不掩瑜。</p> <p>本文是作者认真的学习态度、积极的学术精神或热情、较好的学术能力的综合体现，连同四万多字篇幅，应属有分量的高质量本科论文。</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导师签名：</p>				

内容摘要

1882年8月，格莱斯顿任首相的英国自由党政府最终以单独出兵的形式，镇压了乌拉比领导的埃及民族运动。既往研究多从战略规划和经济利益角度来解释英国政府出兵埃及的原因，但却忽视了格莱斯顿内阁的独特性，即其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本文则关注内阁中一度反对对外干预和使用武力的这部分自由主义者，通过回答内阁自由派为何及如何完成了蜕变，来解释英国为何出兵埃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英法竞合关系、英国在埃利益集团、主战的信息和舆论等外在压力，以及自由派通过重新阐释自由主义原则完成的内在转变，共同促成了自由派对武力干涉方案从压制，退让，再到主动辩护的蜕变。而由于自由派是对埃出兵的主要反对力量，他们的蜕变也就对应了英国政府从不干预，到口头警告，再到武力威慑，直至最终发动战争的政策变化过程。以蜕变的自由派为视角切入英国出兵埃及的问题，既可以加深对英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反思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格莱斯顿；埃及乌拉比运动；英埃战争；英帝国；自由国际主义

Abstract

In August 1882, the British Liberal government with Gladstone as the prime minister finally suppressed the Egyptian national movement led by Urabi by sending troops alone.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explained the reasons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dispatch of troo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economic interests, but they have ignored the uniqueness of Gladstone's cabinet as one of distinctive liberalist character.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liberals in the cabinet who were once opposed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the use of force, and explains why the British sent troops to Egypt by answering how the liberals shifted their stands. It argues that external pressures such as Anglo-French relations, British interest groups in Egypt as well as the pro-war information, and the liberal's internal shift by reinterpreting liberalist principles jointly contributed to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rejection of using force to concession, and lastly to active defense of forceful intervention. Since the liberals were the major opponents of sending troops to Egypt, their shift corresponded to the revision of British policy from non-intervention, to verbal warning, to deterrence by force, and finally to launching a war. Studying the British-Egyptian war in 188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berals in the cabinet,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making process, but also help to reflect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Key Words: Gladstone, Urabi Revolution, British-Egyptian War, British Empir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目录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	2
三、文献综述	3
(一) 帝国战略	4
(二) 经济驱动	5
(三) 决策和行动过程	7
四、研究方法	9
五、核心概念与基本观点	10
六、论证结构	11
第一章 从观望到警告：1881.9-1882.1	13
第一节 埃及危机之始：乌拉比九月兵变	13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坚持：同情和不干预	15
第三节 英国政策走向：“意外”发布的联合备忘录	18
(一) 甘必大与迪尔克的利益交换	18
(二) 英法发布备忘录的影响	19
第二章 从口头警告到武力威慑：1882.2-5	22
第一节 埃及事态激化：二月立宪与四月军变	22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让步：克制的干预	25
第三节 英国政策走向：限于威慑的英法联合舰队	30
(一) 扩张派的攻势与自由派的让步	30
(二) 英法军舰示威的影响	32
第三章 从武力威慑到发动战争：1882.5-7	33
第一节 埃及局势失控：亚历山大港骚乱与港口战备	33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转变：正义而合法的军事行动	36
第三节 英国政策走向：单独向埃及开战	41
(一) 自由主义者们的外在压力	41
(二) 自由主义的复杂性：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帝国	42
结语	45
参考文献	46
致谢	49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1882年7月11日，英国地中海舰队(Mediterranean Fleet)总指挥弗里德里克·西摩尔(Frederick Seymour)下令发动对亚历山大港的轰炸，至此，英国终于以单边武力行动的方式干预了1881年9月以来的埃及危机。7月24日，英国下议院以275票对2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军费预算，授权英政府派远征军登陆埃及作战。9月，加尼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率领的英军攻入开罗，彻底镇压埃及民族运动，逮捕其首领艾哈迈德·乌拉比(Ahmed Urabi)，并开始了英国对埃及数十年的驻军。此后，埃及实际上已成为英帝国的无形领地，英国殖民总监(Controller General)执掌着埃及政治经济的控制权。由是，英帝国的触角延伸到北非，将印度和更远的东方联通。

吊诡的是，实施这一扩张的却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先驱——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领导的自由党政府。1880年，在席卷英国的中洛锡安运动(The Midlothian Campaign of 1878-80)中，格莱斯顿强烈谴责了其时在任的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政府在埃及和阿富汗等地的扩张，认为这些行动既不符合道义原则，也加重了英国的经济和军事负担，并且还会招致其他欧洲帝国的敌意。¹在演讲中，他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外交原则，决心将自由主义思想落成实践：以改良法制和发展经济的方式增强英帝国实力；捍卫和平；维持欧洲协调；避免不必要的扩张和对外义务；尊重民族平等和自决。²1880年，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351席对239席的大胜，确证了“格莱斯顿们”的成功。一个聚集着格莱斯顿、格兰维尔伯爵(2nd Earl of Granville, 本名 Granville Gower)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等自由主义者的新内阁诞生了：在辽阔的世界面前，英帝国以自由、和平与国际主义的姿态跃跃欲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民族运动触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向格莱斯顿内阁袭来。事变之初，英国内阁显现出了鲜明的自由主义风格，多数阁员对1881年9月以来要求立宪与改革的埃及民族运动怀着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即便是后来对埃主战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也在此之列。³除开利益算计的考量，这些自由主义者确曾有过道义动机，他们尊重埃及的自主，期待它以英国为模范的

¹ John Newsinger, "Liberal Imperialism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Race and Class*, Vol.49, No.3, 2007, pp. 55-56.

² 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 with Alice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Second edi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p. 90-91.

³ "It might", he wrote "be the legitimate expression of discontent and of resistance to oppression. If so, it ought to be guided and not repressed." Muriel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Decision Making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abinet,"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 No. 3, 1976, p.240.

立宪改革和文明开化。总之，正如所预想的那样，格莱斯顿政府一度拒绝干预埃及事务，绝不考虑使用武力或武力胁迫，而单独镇压民族运动和长期驻军埃及的结局更无法可想。

那么，格莱斯顿政府为何没能守住和平协商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克制住帝国扩张的脚步，而是在埃及展开了干预，直至实施单边的军事行动和占领？自由主义者们面临着怎样的现实条件，他们的帝国政策是如何受挫、退让，直至异变的？自由主义者的对手是虎视眈眈的法国人，是鼓动帝国扩张的战略派、殖民官员，还是偏狭的自由主义思想本身？

二、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

1882 年格莱斯顿领导下的英国政府为什么要出兵埃及，是一个从当年起就被热烈讨论的问题，但其解释莫衷一是：保护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安全；落实英帝国的战略部署；保障英国人在埃及的贸易和投资利益；抵御埃及军事叛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威胁，等等。且不论这些说辞是否完全符合埃及事态的实情，它们大多将英国政府的决策塑造得过于理性和一致，未能显现出从 1881 年 9 月埃及事变之初，到 1882 年 9 月英国最终攻占埃及，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政策的摇摆和变动，而在这种摇摆和变动之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和观念的竞争。换言之，支持干预和反对干预的分别是哪些人，他们各自的理由是什么？而后者是如何由反抗到让步，再到主动迎合前者，与之达成共识的？

因而，本文以内阁自由派态度和观念的变化为视角，尝试补充对 1882 年英国出兵埃及问题的理解。在这个视角下，回答英国为什么在 1882 年出兵埃及的问题，也就是回答格莱斯顿内阁中的自由主义者们，为什么放弃了不干预的态度，一步步让决策滑向对埃战争的结果？事实上，1882 年英国出兵埃及的原因之所以引发了如此激烈持久的讨论，正是因为其实施者不是别人，而是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格莱斯顿政府。因此，分析内阁中反对干预的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转变的原因，及其如何转变的过程，是回答 1882 年英国出兵埃及问题切中要害的方式；而当反对力量消亡后，出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回答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本文还试图回应一些国际关系研究中更普遍的话题。

首先，格莱斯顿政府出兵埃及的案例，可以印证“对外政策并非由单一行为体作出”这一总结。一方面，格莱斯顿政府对于埃及危机长期存在是否干预和如何干预的分歧，并且无论是主张强硬表态、果断行动的扩张派(Forward Party)，还是相对温和、克制的自由派，都不占据足以独掌局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内阁外的力量，如身在埃及的英国殖民官员、内阁外的信息沟通者和政策执行者，也影响了决策的走向，其作用甚至更加直接。

其次，因应于对外政策的多元竞争特点，对外政策也不是连贯而一致的线性过程的产物。英帝国的扩张常被勾勒为一个具有深刻动机、明确目标和清晰方案的进程。于是，1882 年格莱斯顿政府出兵

埃及的行动被整合进这个历史叙事中，成为英帝国战略竞争和经济扩张的必然。但是如前所说，这个决定实际上并非是逻辑链条中注定的一环，而历经了变化和波折，是由埃及事态的变化、政治精英观念和利益的斗争、意外情况等现实条件碰撞和组合而成的。虽然，帝国扩张作为结果，历史研究可以从后见者的角度对其进行理性化分析，但对于身处情境中的亲历者，决策的走向却是波折而不明朗的。

因此，本文试图反映英帝国扩张过程中的某些纠结与困惑，其着眼点是格莱斯顿时期自由国际主义原则与帝国利益中心考量之间的矛盾。具体到埃及事件上，本文以内阁自由派对武力干预主张由抗拒，到让步，再到支持的这一转变过程，来刻画英国出兵埃及决策的渐进与波折。

最后，本文试图反思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即民族自决与普世价值，世界构想与国家中心，国际和平与正义战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格莱斯顿等自由主义者的欧洲中心观，孕育着这一内在矛盾，它以英国的经验，来规定秩序、进步、幸福和文明的普世意义，而忽视不同民族理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凭借欧洲中心的偏狭视角，自由主义者才能在现实行动中无视这一矛盾，站在秩序平定动乱、文明引导野蛮的高点上，发动对埃及民族运动的镇压和对埃及的军事占领，以及对它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而干预一旦成为文明的责任，战争便自然正义。因此，本文希望联通“自由”与“帝国”在想象中的沟壑，阐释自由主义话语如何与武力侵略和帝国霸权诡异地相融。

三、文献综述

1881年9月，以埃及本土军官乌拉比为首的军事政变，是埃及长期积蓄的内外矛盾的爆发。

1870年代“赫迪夫”(Khedive)¹伊斯梅尔帕夏(Isma'il Pasha)统治时期，由于缺乏规划的现代化建设、统治者个人的奢侈生活、高昂的国际贷款利率和棉花出口因美国内战结束而减少等因素，埃及财政日渐入不敷出，终于在1875年滑向破产的边缘。

为了清偿国际债务，伊斯梅尔在1875年抛售苏伊士运河近半数股权。迪斯雷利政府以400万英镑的价格将其购入，英国由此在埃及具有了更大的经济影响和利益关切，迈出了向其扩张的重要一步。

但出售运河股份的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埃及财政危机远未得到解决。为了保护本国债权和投资收益，英法在1876年底派出经济调查团，继而建立“双重监督”机制(Dual Control)，两名英法财政总监代表国际债主对伊斯梅尔提供财政建议并进行监督，实际上控制了埃及的财政收支。1878年，英法认为埃及现有体制使赫迪夫权力过大，无法从根本上约束其经济开支，遂要求对埃及实施立宪改革，使权

¹ Khedive，源自波斯语 Khidiw，有“总督”、“大人”之意，在埃及最早由穆罕穆德·阿里自封。奥斯曼土耳其在1867年正式承认埃及赫迪夫的地位，即其在名义上虽臣属于土耳其苏丹，实为埃及的最高统治者。

力重心偏向安插有英法成员的内阁。1880年7月，埃及接受英法奥意签署的《清算法》(Law of Liquidation)，规定其财政收入的近半数用于偿还国际债务，而这部分收入由英法财政总监直接控制。¹

除此之外，外国势力也渗透到埃及日常行政管理、军队建设、税收和司法等方面。有1300余名欧洲人占据着埃及的高级行政官职，他们的薪资耗费了埃及财政开支的近5%。而相比之下，为了减少开支，保证外债的稳定偿还，1880年英法财政总监却要求赫迪夫裁减埃及军队规模，并削减在任军人的薪金。此举引发了埃及军队的强烈不满，把以乌拉比为代表的军人势力推向民族抵抗阵营。在社会层面，外国人享有税收特权和司法管辖的豁免，而沉重的税收便落到了本就境遇悲惨的埃及平民身上。1878年以来，埃及旱灾导致的歉收则加剧了这一压力。但为了保证债务偿还，时任英方财政总监的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却直言，自己已知晓埃及农民的穷困境况，但不考虑减税一事。²

于是，矛盾在封闭的埃及社会中蓄积，内外压力逐渐将军队、立宪派和底层平民拧成一股团结的民族力量，它把以乌拉比为代表的军人势力推向前台，最终发动1881年9月的兵变。乌拉比向赫迪夫及其背后的英法提出三项核心诉求：现任里亚得(Riyad)政府下台；建立全民族新议会(The Chamber of Notables)³；扩军至18000人。强权压制下的埃及社会爆出缺口，冲击英法统治的埃及危机由此开始。

在持续近一年的埃及危机中，英国政府主要有三次重大回应，其介入是一个由英法双边到英国单边，由口头或武力威慑到实际动武的过程。首先是1882年1月8日，英国与法国发布联合备忘录(Joint Note)，声明坚决捍卫赫迪夫的威望和权力，警告任何对埃及现状的挑战。接着是1882年5月20日，英国与法国出动联合舰队到亚历山大港，威慑埃及民族政府，要求巴鲁迪(Mahmud Sami al-Barudi)内阁下台，乌拉比免职。最后是1882年7月11日，在英国政府的授权下，地中海舰队总指挥西摩尔发动对亚历山大港的轰炸，由此拉开了英国对埃单边军事行动的序幕。7月24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战争决议和军费预算，授权内阁派遣远征军镇压乌拉比势力。

那么，在危机开始的数月内并不愿强硬介入的格莱斯顿政府，为何走向了出兵埃及的结局？

(一) 帝国战略

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和约翰·盖勒(John Gallagher)基于档案材料，在《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人》(*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一书中给出了比较系统的回答：他们从英法关系和英政府的帝国战略角度，作出了被学界归为“战略派”的解释。

¹ Milad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and Egyptian Nationalist Respon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2, p. 51.

² Newsinger, "Liberal Imperialism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pp. 59-61.

³ 埃及议会又称咨议会，原是1866年由赫迪夫伊斯梅尔建立的咨询机构，没有立法权，仅对赫迪夫提供建议。其人数不超过75人，由各地长老和显贵选举产生，议会会期和议员人选均由赫迪夫决定。

他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英国对埃及的单边军事行动。一是埃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对于英印帝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二是英国与法国在非洲合作与竞争的压力。

首先，埃及的稳定和运河的航行自由对于英帝国的利益十分重要，控制对埃及的主导权是英国政治精英的共识。由于条件允许，英国长期采取的是更经济高效的间接控制方式，即维系赫迪夫的表面统治，而财政和人事的实际控制权则由自身掌握。但是，乌拉比发起的民族运动挑战了既往的统治秩序，英国不得不加以介入。出于既往策略的经验，以及格莱斯顿等人的自由主义主张，英国政府确实长期没有考虑军事行动方案，而希望以口头警告和武力威慑的方式将危机平息。但埃及民族主义者却未按预料行事，而是激烈反抗英法的威胁，要求削弱英法财政总监对埃及内政的控制权、废黜时任赫迪夫，并沿亚历山大港修筑防御工事来对抗英法联合舰队。¹由于局势不断激化，英国既往的不干预策略不再能奏效，再加上内阁中印度大臣哈廷顿伯爵(Marquess of Hartington, 本名 Spencer Cavendish)等人以保卫运河安全、帝国利益和威望为由的极力促动，军事镇压便成为了英国的选择。

其次，英法在非洲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也是将英国推向对埃及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1876年后，英法达成了在非洲扩张的默契：英国承认法国对突尼斯的占有，法国承认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占有，而埃及则由双方共享，并排斥第三国的插手。因此，即便格莱斯顿内阁由于种种考虑不愿干预埃及事务，但由于法国甘必大(Léon Gambetta)政府对埃及民族运动的强硬态度，也不得不追随后者的步伐，以免既失去法国的支持，又放任其夺取对埃及的主导权。但随之发布的联合备忘录却使埃及事态不可收拾，英国只得越陷越深。此外，针对埃及事务的国际协调之所以困难重重，也是因为法国排斥第三国(尤其是土耳其)介入对自身控制突尼斯的威胁，因此这也限制了英国的行动空间。而当法国由于政局变动和战略侧重调整，无意向埃及发动军事行动后，独占埃及以获取竞争优势的考虑又吸引着英国决策者，使其在只能依靠自身力量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出兵。

因此，罗宾逊和盖勒认为，埃及重要的战略地位、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抵抗以及法国的压力与刺激，是英国最终以单边军事行动应对埃及危机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于英国内阁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被外力所迫地、不情愿地选择。

(二) 经济驱动

但是，罗宾逊和盖勒的解释被认为存在以下问题：就埃及民族运动对现状的威胁而言，一方面，埃及民族主义者曾多次表示会捍卫现存秩序，承担国际义务，保证偿还外国债务，保障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权利。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关注也被夸大，直至1882年6月，运河威胁都没有成

¹ 罗宾逊和盖勒在书中提出了“英国政府政策的连续性”(Central Continuity)与“殖民地当地事态的变动性”(Regional Discontinuity)这对概念。

为议会辩论的话题。而就法国的压力而言，事实上，自从 1882 年 2 月法国总理甘必大被对埃政策趋于温和的夏尔·德·弗朗西内(Charles de Freycinet)替代后，英国被法国推着干预的压力便几乎不存在了。在出动联合舰队一事上，反而是英国主动提出的要求。

因此，英国的干预并非为外界情势所迫，而是具有更强的内在动力，它发起对埃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另有所在。

正是在这些反思的基础上，安东尼·霍普金斯(Antony Hopkins)提出了战争原因的“经济解释”，认为捍卫在埃及的经济存在和展开进一步的经济扩张，是英国出兵的实际原因。¹自从埃及现代化改革以来，英国大量商业和金融资本涌入，工商业主、埃及国债持有人、股票投资者和英国殖民官员成为埃及局势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当埃及动乱发生、民间排外情绪滋长以及英国人的特权面临威胁时，这些群体利用政治和传媒上的影响力，歪曲乌拉比等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夸大埃及危机的严重程度，从而塑造主战的公众舆论，向内阁自由派施压；或是直接对内阁施加影响，鼓动其果断采取行动。

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本身就是埃及有重要经济关切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内在地具有干预动机。“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这一概念，揭示了这种权力与资本、政治精英与资本家同构的状态。²自英国工业革命和议会改革以来，资产阶级日渐掌握了政治权力，而既往的土地贵族在经济生活上也日趋资本主义化，二者共同推动了政治权力与资本利益的合一。在帝国问题上，经济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商业和金融动机与战略考虑难以区分。³而自从迪斯雷利在 1875 年以国家名义购入苏伊士运河近半数股份后，英国政府本身也具有了重要的利益关切。因此，当埃及民族运动威胁到英国人的商业特权和投资收益时，英国政府便有充分的动机和理由动用国家力量，对埃及危机进行干预。⁴1879 年，时任赫迪夫伊斯梅尔因解散有英法部长在内的埃及内阁，危及英法对埃及的财政控制而被废黜，就是英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发动干预的例证。⁵

因此，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英国的出兵远非对边缘地带(Periphery)危机的“不情愿”反应，而是发自帝国中心(Metropole)的主动选择。面对在埃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格莱斯顿内阁的不干预态度自

¹ Antony Hopkins, "The Victorians and Afric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1882,"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7, No. 2, 1986, pp. 363-391; Peter Cain and Antony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330-343.

² Paul Iacolucci, *Finance and Empire: 'Gentlemanly Capitalism' in Britain's Occupation of Egypt*, Master dissertatio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4.

³ "Financiers entered the gentlemanly class and socialized with the political elite. Government policy subsequently reflected the aims of both the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elite under a newly defined national interest." *Ibid.*, iv.

⁴ "British interests in Egypt were the product of 'gentlemanly capitalism', which combined the mores of the landed aristocracy and the economic power of bankers. Gladstone's government occupied Egypt in order to rescue British investors, who faced severe losses if Colonel 'Urabi's nationalist movement seized power and repudiated debts." William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Revisiting the 1882 Occupation of Egypt,"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CXXXV, No. 572, 2020, p. 95.

⁵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 p. 341.

始就是松动的；其国际主义的主张也是不真诚的，因为众多阁员本身就是对埃经济扩张的参与者，包括把近三分之一的财产投资在埃及的格莱斯顿本人。因而，利益驱动当然会冲破道义的克制。

(三) 决策和行动过程

霍普金斯观点受到了一些质疑。比如，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在内阁决策中的地位有所夸大。多数内阁成员反对借国家力量为债券持有人和工商业者等特殊群体的利益发动战争，而即便在军事行动已成定局时，英国决策者也极力避免将其作为战争动员的说辞。帝国战略或政治考量，才是出兵的深层原因，而贸易特权和资本收益只是帝国扩张的附带结果。¹

但除了这些相对具体的问题，无论是霍普金斯突出的经济利益，还是罗宾逊和盖勒强调的战略考虑，都属于对英国出兵原因的结构解释。他们的研究主题是经济利益或战略谋划驱动下的英帝国扩张史，对埃及事件的分析只构成其长线叙事的一个片段。这种主题和材料的侧重，既使得1881-1882年英国如何应对埃及危机的过程缺乏完整细致的还原，又局限了对英国政府决策和行动的解释和反思。

首先，长线叙事凸显的是英国政策延续和决断的一面，而不够关注其中的纠结和变动。1881年9月到12月，英国政府层面并没有对埃及事变作出明确的反应。1882年1月，英国与法国发布联合备忘录，但未设想采取单独行动甚至军事行动。1882年5月，英国与法国出动联合舰队，但只限于威慑而非实际动武。1882年7月，英国政府授权西摩尔根据形势采取行动，保护英国舰队和英国人的安全，但尚未下定决心发动战争，甚至军事占领埃及。1882年9月，英军取得胜利，镇压民族运动并逮捕了乌拉比，但其设想是迅速撤军，而非长期占领埃及。

因此，长线解释忽视了英国单独出兵并占领埃及的某种偶然性。事实上，在内阁自由主义者的努力下，应对埃及危机曾存在过其他可能，比如与埃及民族主义者妥协，由土耳其居中调解，或欧洲协调等。关注这些“可能性”为何以及如何一步步丧失，有助于丰富对英国出兵埃及原因的理解。

其次，战略或经济解释是理性化的，它将英国政府乃至整个精英阶层理解为单一的主体，因而英国出兵的决策是一个以上层精英为中心、线性展开的过程。而精英内部的分歧则被这种理性化的叙述消解了，尤其是格莱斯顿等自由派对出兵的长期抵制没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向埃及出兵的决策是在多种力量的冲突和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而这个从冲突、分歧到共识的过程，蕴含着促成英国出兵的复杂因素。

最后，出于以上原因，战略和经济解释没有凸显格莱斯顿内阁的特殊性，即其鲜明的自由主义风格，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导致的内阁在埃及问题上的分歧。自由国际主义与帝国利益中心、和平调解与

¹ Zara Steiner, "Reviewed Work(s): 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 by D. C. M. Plat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3, No. 3, 1970, pp. 546-547.

武力扩张的矛盾，无法仅靠战略谋划或经济利益来消解，而需要深入思想和意义的内部加以反思。霍普金斯没有问的是：既然自由派领袖格莱斯顿在埃及有重要的投资利益，为什么还要长期反对出兵埃及？而他最终却在议会辩论中为出兵埃及背书，并在英军得胜后欢呼雀跃，这种激烈的转变何以单靠利益关切来解释？

因而，决策和行动过程型的研究有助于回应这些问题。这类研究并不成体系或理论，而是更关注埃及危机和英国出兵这一事件本身，它们通过呈现事态进展和重要人物的言行，来反映出兵的决策是如何一步步导出的，从而间接分析其原因。归结起来，这类研究从两个方面呈现了格莱斯顿政府在战争问题上的拉锯。一是扩张派坚决的态度和果断的行动，尤其是哈廷顿伯爵、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奥克兰·科文(Auckland Colvin)和爱德华·马勒特(Edward Malet)等人的关键作用。二是自由派的犹豫和心不在焉，相较于目标明确、行事果决的扩张派，他们没有足够努力地规划和推行替代方案，反而因为对爱尔兰事务的分心而丧失了对埃及局势的掌控能力，从而逐渐让扩张派的主张占据了上风。

威尔弗里德·布伦特(Wilfrid Blunt)在他的《英国侵占埃及秘史：作为事件亲历者》(*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Being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Events*)一书中，最早完整记述了埃及危机和英国决策的过程。作为同时代人，布伦特兼具在英国和埃及两头的亲身见闻，他与英国政治精英和埃及民族主义者都保持着通信，见证甚至影响了格莱斯顿政府的决策过程。在他的讲述中，乌拉比等民族主义者并不极端、冲动，而是愿意与英法力量和解，承担埃及的债务和国际义务，维护现存秩序。并且，格莱斯顿等人通过与他的通信和交谈，对乌拉比等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以及埃及并未失序的实情有一定的了解，国内精英并非全然被主战派蒙蔽。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布伦特的叙述突出了格莱斯顿等自由派对战争和扩张的抵抗；而作为超脱于政坛的旁观者，他也显现出与格莱斯顿等自由派政客的反差，后者面临着战略规划和经济利益的纠缠、党派斗争的压力，终究还是选择了让步、放任，甚至自欺。

穆里尔·张伯伦(Muriel Chamberlain)和亚历山大·索尔奇(Alexander Schölch)则刻画出重要行为者对出兵决策的关键作用。这些人或者是身在埃及的英国官员，即“Men on the Spot”，如曾担任英国财政总监的科洛莫伯爵(1st Earl of Cromer, 本名 Evelyn Baring)、时任英国财政总监的科文和英国驻埃总领事马勒特三人通过传递埃及一手信息，在主战的舆论塑造和政策建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¹或者是英国国内在决策关键时刻的行动者，如迪尔克、哈廷顿和西摩尔，他们分别与备忘录的发表、英法联合舰

¹ Alexander Schölch, "The 'Men on the Spot' and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9, No. 3, 1976, pp. 773-785.

队的出动及亚历山大港的轰炸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¹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人将英国裹挟着滑向战争，而英国内阁并未对决策发挥集中有力的领导作用。

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和阿法夫·马索特(Afaf Marsot)则突出了格莱斯顿等自由主义者对埃及事务捉襟见肘的窘境。²由于内阁中摇摆的中间派成员逐渐转向扩张立场，自由派越来越陷于弱势。同时，爱尔兰问题的分歧又加剧着内阁解体的风险，因此，自由派领袖格莱斯顿为了换取对爱尔兰改革的支持，倾向于放手埃及问题，以便在爱尔兰这个“更重要”的议题上争取共识。两位学者认为，爱尔兰改革是格莱斯顿的政治重心，因而以他为首的自由派对埃及事务的关注度和掌控力不足，这促使了他们对干预和战争的抵抗的失败。

因而，决策和行动过程型研究在两层意义上引出了本研究：一是提供了视角的启发，二是预留了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启发在于这类研究的独特价值，即关注具体和可追踪的现实情境和重要人物，通过梳理决策和行动过程“反映”而非“归结”出兵的原因。这种特点也使它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原始材料，包括人物通信、公众演讲、议会辩论和新闻评论等。

研究空间在于这类研究的不足，即由于缺乏经凝练的主题和线索，各种论述显得相对零散和琐细，阐述有余而解释不足。因而，可以通过选择焦点和提炼线索，来展开后续研究。

综上，基于英国内阁决策过程的视角，本文以自由主义者的蜕变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将既有研究梳理和联通，以补充对格莱斯顿政府出兵埃及事件的思考。

需要承认的是，战略解释，经济解释和决策过程三种研究类型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它们的材料和分析都存在着的共通之处。正因如此，本文虽然基于第三类研究的视角，但也会参考其余研究的材料和观点。

四、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文关注的是格莱斯顿内阁出兵埃及的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如何”发生的进程，来反映产生结果的原因，即“为何”。因此，具体而言，本文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以下特征。

首先，强调决策主体之间的分化、争辩和妥协，而非将其单一化和理性化。本文不将英国政治精英看作主张一致的整体，而是区分出在埃及问题上的扩张派和自由派，呈现两者的冲突、互动和融合。扩张派为什么主张出兵？自由派为什么从反抗到让步，再到主动加入扩张派的阵营？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在回答英国政府为什么最终会出兵埃及。

¹ Muriel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pp. 231-245.

² John Galbraith and Afaf Lutfi al-Sayyid-Marsot,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Another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9, No. 4, 1978, pp. 471-488.

其次，由于强调内阁的分化，以及不同主张者的竞争与互动，本文主要采取的是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即回归现实情境，梳理埃及危机激化与英国政策强化的诱因和进程。相比之下，本文不侧重结构性和理性化的理论建构和科学分析，而更偏向档案分析和历史阐释。

最后，由于本文是在事态和决策的过程中展开对原因的分析，因此，虽以“为何”设问，但很大程度上是以“如何”作答。但二者并不分离，而是处在伴生关系中：原因在过程中展现，过程在诱因下推进。这种研究方法对材料和论述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可以将战略和经济动机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上，解释这些结构性因素是如何实际发挥影响的。

五、核心概念与基本观点

关于本文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在此作出如下界定。

首先是自由主义。本文的自由主义特指以格莱斯顿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其在对外政策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待国际争端和冲突，主张国际协调与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胁迫。对待国家间关系，主张民族平等、自决和互相尊重，反对帝国侵略和扩张。

其次是自由派/自由主义者和扩张派。本文对二者的谈论以英国就埃及危机的应对为语境，以是否在对埃政策上践行自由主义原则，为划分自由派与扩张派的标准。不过，由于现实的复杂和事态的变动，二者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并且各阵营的成员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换言之，一方面，两派的区分是一种理想状态，其态度差别只是相对的。此外，除了少数代表人物，多数人在长期内难以被归为某一端，而近于中间状态。另一方面，随着事态的发展，决策者的态度存在转变的趋势，尤其是对于中间派而言。因此，难以将某些人认定为全然的自由派或扩张派。但是，为了便于叙述和分析，这种划分仍有必要。

基于上述条件，本文对自由派/自由主义者和扩张派具体作出如下描述：

自由主义者/自由派：认同自由国际主义，同情埃及民族运动，不愿意英国介入，更不愿意借此实施帝国扩张。若是出于正当理由而必须加以干预，也要采取和平协商和大国协调的形式。这些人主要以首相格莱斯顿、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和曾在事变中的埃及游历数月并与埃及重要人物有密切交往的布伦特为代表。

扩张派：坚决主张干预埃及危机，并愿意采取武力和单边行动的形式。这些人主要包括英国政府内部的帝国战略派、英国在埃及当地的殖民和外交官员等群体，以印度大臣哈廷顿伯爵、外交政务次官(Parliamentar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迪尔克、英国在埃财政总监科文和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勒特等人为代表。

基于此，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格莱斯顿内阁中的自由主义者是出兵的主要反对者，而他们的退让、消失或转变，则意味着英国政府单独出兵决策的逐步形成。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内阁自由派从坚持原则，到逐渐让步，再到完全转变态度的过程，来解答英国政府为何最终单独发动对埃战争的问题。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者在政策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可从两个方面看待：一是外界的强大攻势，一是内在的软弱和矛盾。

就外在因素而言，扩张派具有坚定的决心和清晰的目标，并通过联合法国、控制信源、引导舆论和率先行动等手段，逐渐掌握了对埃及事务的控制权。

就内在因素而言，自由派既在策略上缺乏可靠的替代方案和果断的执行力，又在思想上存在矛盾，其欧洲中心的自由主义本身便为扩张预留了空间。可以说，正是格莱斯顿等自由主义者，为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话语和谐作出了论证，帮助英国以“自由帝国”之名，心安理得地展开新一轮扩张。

六、论证结构

本文按照事态和决策的关键节点来划分论证层次，从1881年9月乌拉比兵变开始，到1882年9月英军占领埃及为止，将自由主义者逐渐失势，或英国逐渐滑向单边战争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自由主义者的坚持。1881年9月乌拉比兵变到同年12月期间，格莱斯顿内阁不干预埃及危机的主张占据主导，直到1882年1月英法发布备忘录，从而开启了英国向强硬干预的转向。但此时，武力威慑或战争行动还远不在内阁的考虑范围内。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还能应付扩张派的压力，把控局面，设想通过口头警告来恢复既往秩序。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在内心上也没有动摇，希望通过劝导而非动武来平息埃及民族运动，并一度试图软化备忘录的措辞。

第二阶段为自由主义者的让步。这一过程始自1882年1月英法备忘录的发表，止于同年5月20日英法将联合舰队开入亚历山大港，武力震慑埃及民族主义者。备忘录的发表在埃及激起了超出英国预料的反抗，埃及从精英到民众对英国的戒备迅速加强，乌拉比等人不再愿意妥协，坚决要求修改宪制，以提高埃及议会对财政的掌控权。同时，民族主义者与时任赫迪夫穆罕穆德·图菲克(Mohamed Tewfik)的对抗公开化，后者面临被废黜的危险。基于这些事态，英国扩张派具备了捍卫经济利益、运河安全、文明秩序和帝国威望等多种干预理由，内阁中的自由主义者虽还没有完全被劝服，仍保留着对国际调解与和平协商的期待，但已经降低了干预的底线，容许以威慑而非动武的方式，平息埃及的动荡。

第三阶段为自由主义者的转变。这一转变显现于1882年7月上旬英国内阁对西摩尔在埃自由行动的授权，而7月24日格莱斯顿的议会演讲则标志着它的完成。英法舰队开入亚历山大港的行动非但不能压服埃及民族主义者，反而加剧了埃及人与欧洲人的矛盾，诱发了6月11日的亚历山大港骚乱，造成约50名欧洲人和250名埃及人丧生，其中包括3名英国人。与此同时，出于对英法军舰的戒备，乌

拉比开始领导埃及军队在亚历山大港修建防御工事。于是，这些事态不仅印证了扩张派关于埃及民族运动造成运河威胁、债务风险和秩序混乱的言论，强化了其对自由派的攻势，还帮助自由主义者们完成了自我说服：如果战争是为了和平，武力针对的是军事冒险，那么英国出兵不仅是正义的自卫，也是文明的责任。由此，格莱斯顿等自由派在内外作用下，终于转向了出兵立场——除了布莱特以辞职作结。而格莱斯顿和布莱特的反差也暗示着，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矛盾和在行动上的窘迫：道义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兼顾是幸运的例外，而取舍则是被接受的常态。

为了让论述更有条理，章节之间衔接更流畅，本文对每部分的安排如下，以呈现格莱斯顿等自由派逐渐蜕变，英国政策趋向强硬的原因和过程：

- 一，陈述埃及危机的阶段性背景；
- 二，呈现自由派和扩张派各自的行动方案及其理由；
- 三，解释埃及事态和内阁决策如何走向了不利于自由派的结果；
- 四，分析英国的阶段性政策如何影响下一阶段的事态。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第一章 从观望到警告：1881.9-1882.1

第一节 埃及危机之始：乌拉比九月兵变

承上所述，自 1875 年埃及伊斯梅尔政府破产，英法以协助埃及恢复经济秩序和履行国际义务为由，加深对其渗透和控制以来，埃及的内外矛盾便日益激化。

国内，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无法忍受向英法步步妥协、出让埃及主权的现政府。对外，埃及人排斥英法的情绪加深，而在民情的促动下，伊斯梅尔本人也试图削弱外国人的影响。1879 年，伊斯梅尔为了摆脱英法阁员对埃及事务的操纵，解散原内阁，而重新召集完全由埃及人组成的新内阁。此举引发英法警惕，在其迫使下，土耳其苏丹废黜了伊斯梅尔，而任命其之子图菲克为新赫迪夫。¹

可以想见，新任赫迪夫图菲克更为软弱，英法权力愈发不受制衡。1880 年 6 月，图菲克签署《清算法》，确保埃及财政收入的近半数用于偿还外债，剩余部分留作埃及内部开支，但其使用实际上也受到英法主导的债务委员会 (Public Debt Commission)² 的监控，英法遂借此影响着埃及的内政。

同时，自 1879 年开始，出于节省财政开支，保证外债清偿的考虑，英法财政总监要求裁减埃及军队人数，并削减剩余军人的薪酬，有 2500 余名军官的收入被减半。此举引发了以乌拉比为代表的军人群体的强烈不满。³

在这些事态的作用下，1875 年以来的埃及内外矛盾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激化。尤其是裁军一事将军人势力推向反抗者阵营，从而增强了埃及民族运动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1881 年 1 月，埃及本土军官乌拉比率领军队向政府抗议，要求撤换现国防大臣乌斯曼·里夫 (Uthmān Rifqī)，并提出对军人任用和提拔条件的质询。乌拉比等人一度因此被捕，但其军中盟友却很快将其释放，并一齐行军至赫迪夫宫前，重申军队的诉求。最终，乌拉比等人的要求得到满足，但埃及本土军人与赫迪夫和现政府的矛盾却大大激化。⁴而英法对乌拉比等军人势力的猜忌和对埃及失序的疑虑也随之加深。

¹ Nancy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1880-1885*, Master dissertation, North Texas State University, 1975, p. 15.

² 其成员包括英国、法国、奥匈、意大利、德国和俄国。

³ *Ibid.*, p. 15.

⁴ *Ibid.*, pp. 23-24.

一方面，乌拉比代表的军人势力的胜利吸引着民族主义者的注意力，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另一方面，1881年4月，法国侵占突尼斯的突然消息加深了埃及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惧。¹在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原本目标有限的军人势力开始与埃及立宪派²联合，提出更系统、更具政治意义的改革方案。9月9日，以乌拉比为首的军人势力发动兵变，提出三项核心诉求：组建更具独立性的新内阁；选举产生新议会；扩大埃及军队规模至18000人，并罢免部分土耳其和切尔克斯族(Circassian)³军官。赫迪夫图菲克最终让步，同意召集新议会，并允诺立宪。⁴

9月11日，埃及原总理里亚得辞职。三天后，出身切尔克斯族的立宪派代表梅米特·沙里夫(Mehmet Şerif)接任总理职位并组阁。相比于乌拉比，沙里夫的改革主张更温和，他一方面希望赢得议会和军队的支持，一方面又尽量遏制他们对“双重监督”体系的挑战，试图与英法势力共存和合作。⁵这为1882年2月埃及的政府危机埋下了伏笔。

10月，沙里夫起草了一部新宪法，试图在埃及建立责任制政府，规范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财政问题的规定为：政府征税须经议会同意；议会有权讨论由埃及控制的半数财政预算，但没有表决权，更不能触及用于偿还外债的财政收入。这部宪法在英法财政总监的监督和许可下完成，实际上并未触动既有秩序。由于新宪法的妥协性，埃及议会发出抗议，欲争取在国家事务上更大的控制权，尤其是对财政收支的审议和表决权。⁶

截至此时，埃及的政治格局呈现如下：一，名义上的统治者赫迪夫，由图菲克担任。二，由英法财政总监领衔的债务委员会，两位英法长官虽不在政府内，却实际主导着埃及的政治经济事务，其任免权在英法而非埃及。三，埃及政府，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乌拉比在其中任国防副部长(Under Secretary of War)。四，埃及议会，拥有一定的咨议权。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08.

² 埃及立宪派的核心诉求是：反对赫迪夫专制统治，主张在埃及建立代议制政府。其代表梅米特·沙里夫(Mehmet Şerif)属于出身切尔克斯族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乌拉比代表的埃及土著军人群体的利益和主张有所不同，前者在议会财政权问题上试图向英法让步，以避免冲突。

³ 原住高加索黑海沿岸，属于埃及的外来民族，但长期占据着埃及统治阶层。

⁴ *Ibid.*, pp. 116-126.

⁵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1880-1885*, p. 25.

⁶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对埃及阿拉比事件中英国报刊“舆论一致”现象的研究（1881-18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4年5月，第17-18页。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坚持：同情和不干预

埃及事变发生后，英国尽管存在着要求清除乌拉比，镇压民族运动的主张，但这些主战的声音并非主流。总体上，英国政府保持着不干预的立场，对埃及民族运动怀观望态度。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等自由主义者甚至表达了对埃及通过改革走向进步、自由和繁荣的同情和期待。而处在二者之间的中间派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功利考虑，也不认为有干预的必要。因此，直至 1881 年底，格莱斯顿内阁对埃及事变的回应仍秉持着自由主义风格，其原则与实践尚未呈现出矛盾之处。

在自由派领袖格莱斯顿看来，不干预埃及民族运动不仅出于道义考虑，即捍卫平等、自由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民族自决权，也包含着现实的战略意义：通过释放善意而赢得埃及人的认同和信任，有利于英国以更经济、更可靠的方式扩大在埃及的影响力。¹在是否赋予议会部分财政收支表决权的问题上，格莱斯顿在 1882 年 1 月 4 日表示，“既然埃及能保证偿还对外债务，便应支持议会的提议。”²“Egypt for the Egyptians”，正是他对自由主义的实践。

围绕在格莱斯顿周围，格兰维尔在这段时期表达了相似的主张。1881 年 10 月，他代表英国政府明确回应，英国不会主动干预埃及事务，除非埃及出现无政府状态，或苏伊士运河通航受到影响。如果这份声明更多体现的是对英国利益的现实考量，那么格兰维尔在这段时期发给马勒特的信函则流露出更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他表示，可以考虑接受埃及人管理部分财政事务的诉求。³英国政府看好埃及民族政府在教育、税收和司法等方面进行的改革，期待它将埃及引向进步和文明。⁴而英国除了埃及人民的自由和繁荣，别无他求。⁵当然，格兰维尔的出发点并不一定超脱、无私，但乐见以英国为范例的现代化文明在埃及扩散，通过无形却深远的方式增强英国的影响力，本就符合自由主义的行事逻辑。

而内阁之外，布伦特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则利用自己熟悉埃及人事和身处埃及的优势，发挥着在英埃之间传递消息和居中调解的作用。他在 1881 年 10 月抵达埃及，亲身观察和经历着埃及民族运动。12 月，他第一次与乌拉比见面交流，并将谈话内容和自己的看法写信传达给格莱斯顿和马勒特。他认为，乌拉比不仅理解并认同自由主义思想，而且懂得结合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现状将其加以实践，绝非野蛮无知、出于个人野心的军事冒险者。此外，乌拉比也并不挑战英法“双重监督”体系下的现状。

¹ “Indeed, Gladstone set out his opposition to any British intervention to suppress an Egypt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Aggression in Egypt and Freedom in the East’. In his thinking, the occupation of foreign peoples against their will sapped British strength.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had a strategic as well as moral purpose.”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01.

²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 131 页。

³ 同上，第 132 页。

⁴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p. 233.

⁵ “The policy of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towards Egypt has no other aim tha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its full enjoyment of that liberty which it has obtained under successive Firmans of the Sultan.” Iacolucci, *Finance and Empire*, p. 30.

他承认英法财政总监对埃及政治改革和财政平衡的积极贡献，并接受其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希望其不要无条件地捍卫赫迪夫。¹乌拉比甚至表达了对英国政府尤其是格莱斯顿的期待，希望其能帮助埃及走向自由和独立。²

由于超脱于政治斗争的漩涡，布伦特对自由主义的践行更为坚定和顽强。他折返于英埃之间，化解双方的猜疑和矛盾，极力抵抗主战的压力。而他的确为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提供了重要支持，也扭转了摇摆不定的英国驻埃总领事马勒特的态度。9月，乌拉比兵变之初，马勒特尚对埃及民族运动充满戒备，在给格兰维尔的信中将埃及议会称作“危险的实验(dangerous experiment)”，将乌拉比斥作“不识字的极端分子(illiterate fanatic)”。但在接下来3个月的通信中却改变态度，转而肯定乌拉比和埃及新政府的真诚、温和和爱国，称其可以信任，而不认为英国有干预的必要。³借助布伦特的居中沟通和调解，马勒特缓和了与乌拉比等人的关系，自信凭温和处理便足以平息和掌控局势，而不需英国政府另作干预。⁴

当然，自9月事变以来，英国政府内部和在埃殖民当局并不乏要求发起强硬行动的主张。

比如，担任英国财政总监的科文，在兵变当时便建议图菲克果断武力镇压抗议者，暗杀为首的乌拉比，并暗示英法将提供支持。⁵他还借助自己在《波美公报》(*The Pall Mall Gazette*)和《泰晤士报》(*The Times*)的驻埃记者身份，夸大埃及危机并散播“独家”消息，渲染埃及的失序及其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塑造主战舆论。⁶再如被格兰维尔称为“内阁唯一的好战派(Jingoism)”的印度大臣哈廷顿，他出于帝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主张借此机会向埃及发动领土扩张，以作为对法国占领突尼斯的补偿。⁷

但是，在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的克制，以及布伦特的沟通和调解之下，英埃关系基本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乌拉比等人的诉求尚未冲击到英法对埃及的主导格局，英国殖民者和债权人的利益也没有受到明显威胁。因此，态度相对模糊的中间派，诸如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伯爵(1st Earl of Northbrook, 本名 Thomas Baring)，虽没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偏好，但出于功利考虑，认为只要能保证埃及落实《清算法》，承担其对外国债权人的义务，也认同不干预的态度。⁸

到1881年底，埃及局势基本平息。身处埃及的布伦特备受鼓舞，1882年1月2日，他在给格兰维尔的信中感叹道，埃及的未来从未如此明朗而充满希望：对外，民族政府与英法财政总监互相争取着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17-118.

² Ibid., pp. 132-133.

³ Ibid., p. 119.

⁴ Galbraith and Afa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76.

⁵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16.

⁶ Donal Buchanan,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and the Political Press, 1882*, Master dissertation, Texas Tech University, 1997, p. 109.

⁷ Mulligan, “Decision for Empire,” p. 103.

⁸ Ibid., p. 105.

共存以至共赢，既保持埃及的独立自主，又接纳英法的影响，以保障外国债权人的利益。¹国内，各阶层团结在埃及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前景之下，自由主义式的改革正稳步推进。²

此时，即便是一度欲除乌拉比以绝后患的科文，也坦承已接受了这场民族运动，“(Colvin) *professed himself converted and half inclin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revolution.*”³

乍看之下，自由主义者的坚持取得了胜利，埃及危机已通过对话和妥协的方式得到平息。那么，英国为何在紧接着的 1 月与法国发布了立场强硬、措辞严厉的联合备忘录，从而使自己卷入越陷越深的干预中？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37.

² *Ibid.*, pp. 116-117.

³ *Ibid.*, p. 128.

第三节 英国政策走向：“意外”发布的联合备忘录

(一) 甘必大与迪尔克的利益交换

布伦特认为，他之所以对埃及事态抱有了错误的期待，恰恰是因为事变之因不在自己身处的埃及，而是在埃及之外。他认为，法国新总理甘必大的上台，就是内阁自由派心怀侥幸地向扩张派让步，使英国向干预越陷越深的引子。

1881年11月15日，甘必大上台担任法国新总理，这导致了法国对埃及政策的转变，也意味着英国难以再置身事外。出于对法占突尼斯的稳定和向北非扩张的考虑，甘必大非常戒备埃及的民族运动，担心其向外扩散，以致引发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甚至泛伊斯兰世界的叛乱(Pan-Islamic rising)。¹因此，他希望及时遏制埃及政府的自主倾向，并鼓动英国一同开展干预行动。

而外交政务次官迪尔克则是英方应和甘必大的关键行动者。自1881年5月以来，迪尔克便代表英国展开了与法国续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漫长而艰难的谈判。而甘必大的诉求则为贸易谈判带来了转机，迪尔克与甘必大一拍即合，达成了对埃联合干预行动与英法自由贸易协议的利益交换。²

12月15日，甘必大通过英国驻巴黎大使理查德·里昂斯(Richard Lyons)向伦敦传达在埃及展开联合行动的提议，主张双方声明对赫迪夫权力和地位的坚定支持，以警示乌拉比等民族主义势力。19日，格兰维尔出于自由贸易协定和英法在埃合作的考虑，接受了甘必大的提议，但表示需考虑好理由和措辞。28日，迪尔克赶赴巴黎，迅速签署了半年未果的贸易协议。同日，格兰维尔正式同意向赫迪夫图菲克表达英国的支持和承诺。³

于是，由甘必大亲自起草的备忘录在31日经里昂斯转交伦敦。1月6日，英国内阁讨论通过决议，同意与法国发布这份联合声明。但直至此时，内阁自由派仍希望保持对干预的克制。在签署备忘录时，格兰维尔对其作出保留，声明此举并不代表英国一定会发动某种行动。“Her Majesty's Government must not be considered as committing themselves thereby to any particular mode of action.”⁴

1882年1月8日，由甘必大起草、英法联合签署的备忘录发布了，两大国以强硬措辞表示坚决维护赫迪夫的权位和埃及的现状，警告任何势力都不要试图挑战现存政治格局。

“That the English and French Governments consider the maintenance of His Highness on the throne...as alone able to guarantee for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good order and general prosperity in Egypt...The two Governments being closely associated in the resolve to guard by their united efforts against all cause of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22.

² *Ibid.*, pp. 139-140.

³ “The same day Lord Granville agrees to give ‘assurance to Tewfik Pasha of the sympathy and support of France and England, and to encourage His Highness to maintain and assert his proper authority’”. *Ibid.*, p. 140.

⁴ *Ibid.*, p. 141.

complications internal or external which might menace the order of things established in Egypt...will tend to avert the dangers to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the Khedive might be exposed, and which would certainly find England and France united to oppose them...”¹

(二) 英法发布备忘录的影响

内阁中的自由主义者为何没有坚持不干预的态度，而是向埃及民族政府发出了威胁性警告？这个选择是否违背了自由主义者的原则，意味着他们的挫败？

承前所述，直至甘必大上台，与迪尔克私下达成交换前，英国政府基本保持着对埃及事务的观望态度，甚至还对民族运动怀有同情和期待，格兰维尔代表英国作出的表态便呈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风格。

在布伦特看来，备忘录的发布就像晴空中的闪电(thunder in a clear sky)，是被“扔”到(launched upon)众人头上的，它背离了“所有人”的期望和估计。即便是一度要求镇压乌拉比等人的科文，也对备忘录加以责备。²

因此，是常态之外的人和事，诱发了此时英国对埃政策的转变，而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等人对这一变化估量和应对的失误，则使这场转变得以发生。

甘必大上台及法国对埃政策的调整，与迪尔克借此机会的推波助澜，正是诱发英国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甘必大对埃及的强硬姿态和对北非的扩张野心让英国政府内的扩张派感受到竞争压力，担心此时若不参与联合行动，便将失去对埃及事务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英法悬而未决的自由贸易协议也为二者在埃及的合作提供了契机，而与甘必大私交甚笃且极具行动力的迪尔克则抓住机会，果断将其落为实践，促成了备忘录的发布，并且追随甘必大的意愿，反对软化备忘录的措辞或对其作出补充解释。³布伦特认为，迪尔克借贸易协定谋图政治升迁的个人考虑，是他支持甘必大、果断推动备忘录发布的重要动机。英国为他的私利裹挟着，陷入了干预埃及事务的深渊。

另一方面，在内阁自由派看来，英法贸易协定的签署是自由主义在贸易政策上的重要胜利。此外，在他们眼中，备忘录本身无伤大雅，这种口头警告是相对温和、自然的行动，它只是对既往政策的延续和对既有秩序的重申，并不意味着英法对埃及的进一步扩张，更并不意味着与民族政府的对抗和战争。

¹ Buchanan,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and the Political Press, 1882*, p. 58.

²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44.

³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p. 235.

1月6日，内阁讨论通过备忘录后，英国驻巴黎大使里昂斯还向甘必大表示，英国给予法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并不保证参与任何特定形式的行动。¹

而身处埃及的马勒特对备忘录可能引发的后果更为敏感。他为备忘录的强硬辞令感到忧惧，担心这将破坏英埃关系的稳定局面，使既往间接控制埃及的路线难以延续。“镇压第一个试图建立代议制的穆斯林国家，这对英国而言并不合适。”²因而，他建议格兰维尔另附一份解释，让埃及人相信此举并非威慑民族政府，而是针对土耳其苏丹，以防止其干涉埃及的独立自主。³格兰维尔接受了马勒特的主张，10日，他通过里昂斯向甘比大提议为备忘录增加补充解释，表明英法无意威胁埃及民族政府。⁴尚处于摇摆中的张伯伦此时也批评备忘录，认为乌拉比运动或许只是埃及人对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和反压迫诉求的合理表达。如此一来，对埃及民族运动便应该“引导”而非“镇压”。⁵但在甘必大和迪尔克的坚决反对下，补充解释最终未能发出。⁶

自由派的追悔和补救，及其此后对埃及反响的始料不及，实际上从反面印证出至少在决策之时，他们自认为践行了自由主义的政策路线。

但事与愿违，备忘录的发布造成了意外却不可挽回的后果，它如同落入矿井中的火苗，迅速引爆了埃及局势。⁷

英国与法国的联合磨灭了埃及人对英国的信任。在此之前，相当一部分埃及人认为英国不同于在北非扩张的法国，是埃及民族运动真诚而心怀善意的支持者。⁸而备忘录的发布却显现出英法的同流合污。⁹联想到突尼斯的遭遇，埃及人加深了对英法的警惕和对自身命运的忧惧。乌拉比斥责英法此举是对埃及尊严的践踏，英国不过是将埃及人当作天真无知而不能自主的小孩。萦绕着的外在威胁强化了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凝聚力，他们团结在乌拉比周围，更激烈而坚定地反抗英法和屈从于英法的赫迪夫。此后，埃及愈发面临着革命和内乱的风险。¹⁰

¹ “Lyons limited the support he gave Gambetta; he added that it was very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at Britain was not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articular mode of action, ‘should action prove necessary.’”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1880-1885, p. 28.

²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113页。

³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43.

⁴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p.235.

⁵ “It might”, he wrote “be the legitimate expression of discontent and of resistance to oppression. If so, it ought to be guided and not repressed.” Ibid., p. 240.

⁶ Galbraith and Afa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81.

⁷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p.233.

⁸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39.

⁹ Galbraith and Afa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75.

¹⁰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44-145.

也正因如此，英国不可避免地更加强硬、激烈地干预埃及事务，进而又诱发埃及新的危机，使事态陷入恶性循环——直至英国最终出兵镇压乌拉比运动，并实施军事占领。

“Our government may not like it, but they are bound now by formal engagement to France and cannot withdraw.”¹前英国财政总监威尔逊此语，正是对格莱斯顿政府窘迫处境的刻画，它也暗示着自由主义者的“坚持”，正走向瓦解和蜕变。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42.

第二章 从口头警告到武力威慑： 1882. 2-5

第一节 埃及事态激化：二月立宪与四月军变

九月事变平息后，1882年1月，埃及新政府将立宪与改革提上日程。其中，最重要也最引发争议的内容涉及到财政改革，埃及民族政府试图将议会对半数财政预算的审议权写入宪法(Organic Law)。

这引发了英法财政总监的警惕。科文明确反对这项主张，要求绝不能动摇英法自1876年以来对埃及财政的控制权，换言之，财政预算不能在埃及议会审议和表决的范围内。虽然埃及议会强烈反对，声称英法只有权控制用于还债的那一半财政预算，而剩余部分的使用则须经埃及议会的讨论和审议(“subjecting the half of the Budget not affected to the interest of the debt to vote by the Chamber”)。但在土耳其苏丹的施压下，埃及总理沙里夫选择了向英法妥协，起草了一份未写入议会财政审议权的宪法草案。

正是在这个多方拉锯的关键时刻，英法发布了联合备忘录。如前所说，此举当即引起埃及人强烈的警惕和反感，议会坚决反对向英法妥协，认为财权是议会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基础。于是，埃及议会另外起草了一份与沙里夫针锋相对的法案，要求扩大议会权力，坚持议会对半数财政收支的审议权。英法财政总监不予让步，执意财政收支不可分割，排斥埃及议会对财政的介入。¹

一方面，沙里夫因其切尔克斯族出身，与埃及民族主义者本就存在隔阂。另一方面，他自诩深谙西方文明而轻视埃及本地人，认为他们天真莽撞，无法独立领导埃及进步，而需要被引导和教化。因此，他压制议会和军队的诉求，主张改革需要有所克制，埃及应与英法达成妥协。²

2月2日，在埃及议会和军队的压力下，沙里夫辞职，由巴鲁迪接任总理，乌拉比则由国防副大臣升任国防大臣。由此，埃及民族主义者加强了对政权的控制，政府与军队走向深度联合。³沙里夫的障碍消除后，巴鲁迪新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修改后的宪法，其中写入了议会对半数财政预算的审议权。⁴此外，新政府还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冗余的欧洲行政官员，降低其过高的薪金；削减不必要的娱乐开支(直指由欧洲人创建、每年耗费9000英镑的欧洲歌剧院)，⁵提拔600余名埃及本土军官，授予乌拉比将军军衔，而罢免300余名土耳其和切尔克斯族军官，等等。⁶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48.

² *Ibid.*, p. 149.

³ *Ibid.*, p. 153.

⁴ Dan Halvorson, “Prestige, Prudence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1882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56, No. 3, 2010, p. 429.

⁵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57.

⁶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20页。

虽然在立宪和改革方案上拒不让步，但乌拉比等人仍表达了与英法和平共处，友善往来的意愿。2月末，在与布伦特的交谈中，乌拉比表示愿意与英国政府达成共识，而不将科文和马勒特此前的敌对行为放在心上。他尤其对布伦特描绘的自由主义者——首相格莱斯顿抱有期待，希望他派人到埃及了解真实情况，促进英埃的沟通和理解。同时，乌拉比也没有放松警惕，他坚持在建立起埃及的立宪政府，并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之前，不会削减武装力量 and 解除军事戒备。¹

3月，新宪法正式由赫迪夫签署并发布。在布伦特看来，埃及危机再度得以平息：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得到满足，英法政府未有明确的干预意向。而极力主战的法国总理甘必大已在1月末下台，其继任者弗朗西内克制在非洲的扩张，将精力集中在欧洲，以应对上升的德国威胁。

此时，埃及又呈现出安定与平静的迹象。4月，乌拉比在信中向布伦特表示，会尽全力维持埃及的安定和有序，继承并履行好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只要欧洲各国保持友善，埃及政府绝不会触犯其权益。而摆脱奴役、不公和蒙昧，遏制专制统治的复辟，是埃及人唯一的诉求。²

但表面的平静之下潜伏着未能化解的矛盾。一方面，英法财政总监与埃及议会和政府争夺着财政掌控权，尤其是态度强硬的科文，他绝不容忍触犯既有秩序的埃及新宪法，决心摧毁(ruin)乌拉比等人的统治。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展开，乌拉比等埃及本土军人的影响力增强，而军队中土耳其和切尔克斯族将领的权势则受到削弱，后者加大了对乌拉比的忌恨，并密谋发动对他的暗杀。

同样出于对乌拉比等人挑战既有秩序的不满，沙里夫、马勒特和科文暗中参与了军中密谋活动，以推翻埃及现任政府，尤其是除掉乌拉比。但事与愿违，4月25日，切尔克斯军人小圈子里的拉希德(Rashid Effendi Anwar)将阴谋揭露给乌拉比。于是，参与者迅速被乌拉比逮捕和监禁，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³

纷争中，埃及赫迪夫图菲克站在了力量更强大的英法一方。在马勒特的暗中怂恿下，图菲克拒绝签署流放叛乱者的判决。由此，赫迪夫与乌拉比等人的关系公开破裂，埃及政府和议会开始考虑废黜图菲克，并以45:30的投票结果通过行动方案：如果图菲克继续按英法的意志行事，阻碍埃及的自主，议会便有权将其废黜。而马勒特则暗示图菲克，英法已命令舰队开往亚历山大港，以维护埃及的现有秩序。于是，图菲克一时未作出让步。⁴

四月军变及其后续处理激化了赫迪夫与乌拉比等人的冲突，二者之间即便连表面的和谐也难以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埃及内部的政治斗争正是民族主义者与外部势力对抗的显现，英国政府自然难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60.

² *Ibid.*, pp. 187-188.

³ *Ibid.*, pp. 191-193.

⁴ *Ibid.*, pp. 204-205.

以置身事外。军人叛乱和埃及失序的事态是科文等人乐见其成甚至亲手推动的，但英国内阁中的自由主义者又会作出怎样的回应？他们是否会坚持克制干预，和平调解争端的主张？如若不是，又是什么条件让他们选择了让步？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让步：克制的干预

英法备忘录与埃及新宪法，如同一对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对手，共同将埃及危机推向更激烈的局面。作为其中一方的英国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出招”。

这一次，民族政府的改革直接触及英国在埃及的经济存在，关系到英国殖民官员、英国债券持有人和股票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也抵抗着英帝国向非洲扩张的触角。于是，扩张派具有了切实的行动理由，他们将现实利益和帝国负重抛向自由主义者身前，试图击垮其道义和理想的防线。而中间派本就少有原则的负担，在利益和权力的诱惑下，他们几经算计还是轻盈地偏向于扩张阵营。

3月，布伦特在埃及危机后首次回国，此时的内阁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The great Whig leaders who controlled the chief departmen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Hartington, Northbrook, Childers, and the rest were all for strong measures, Gladstone, with Harcourt and Bright, almost alone for conciliation, and the general feeling of the country was violent against all ‘lawlessness’ everywhere.”¹

布伦特的看法也许缺乏足够的依据，但它多少反映出了格莱斯顿内阁在埃及立宪危机后的政策风向，暗示着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作出的转变。

对于内阁中坚定的自由派格莱斯顿而言，直至三月底，他对埃及的态度仍可说是一贯的，即不会发动政府力量进行干预，愿意倾听民族主义者的诉求，甚至发自内心地对其怀有理解和同情。

2月27日，当埃及议会通过新宪法，民族政府发起进一步改革后，格莱斯顿向布伦特回信承诺，自己对埃及的政策并未改变，一如往常。也就是说，出于节省开支和捍卫道义考虑，格莱斯顿如同当初反对迪斯雷利购股一般，仍会克制英国在埃及的扩张。²3月22日，他接见从埃及回国的布伦特，悉心询问他有关埃及民族运动和埃及军队的情况。布伦特向他一一阐述实情，澄清乌拉比的真实形象。这场谈话持续数小时，格莱斯顿表现出对埃及事态明显的热心和投入，甚至将中途因公事到访的格兰维尔拒之门外。³

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虽不如格莱斯顿那般对自由主义怀有道义热情，但仍尝试以和平和多边协商的方式化解埃及危机。相较于格莱斯顿，他对埃及问题的看法更具有现实色彩，将维护英国在埃及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视为一切讨论的前提，基于这个目标，再考虑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而就捍卫英国利益的方式而言，谈判而非动武，国际协调而非单边行动，是格兰维尔不同于哈廷顿和科文等人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体现出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风格。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63.

² Buchanan,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and the Political Press, 1882,” p. 5.

³ “His manner was so encouraging and sympathetic that I spoke easily and with an eloquence I had never had before, and I could see that every word I said interested and touched him.”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78-180.

英法备忘录发布后，俄、奥、意、土发出抗议，要求英法不要激化埃及局势，以借机干预和发动扩张。除非欧洲各大国与土耳其一致同意，任何国家不得单独采取行动。格兰维尔在给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达弗林伯爵(1st 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 本名 Frederick Blackwood)的信中否认了英国的扩张意图，表明其无意在埃及占据主导，也不支持任何国家攫取这样的地位。英国所做只是因为不希望埃及陷入无序。¹埃及二月立宪和政府改革发生后，格兰维尔一度考虑接纳埃及议会的诉求，只要后者承诺履行对外国债权人的义务。²

可以看出，格兰维尔的态度比较纠结，也相对务实。一方面，他保留着自由主义者对军事行动的克制和对领土扩张的反对。³另一方面，他又以捍卫秩序和利益为由，为干预甚或武力行动预留了空间。而保卫秩序、文明和理性，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向现实压力让步，甚至转而自我说服的重要托辞。3月末，面对布伦特的质询，格兰维尔坦陈，如果埃及民族政府不在预算问题上妥协，武力干预便很难避免。⁴而4月初，在埃及军队骚乱发生前，格兰维尔则再度表现出与乌拉比等人和解的意愿，考虑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接受他们对埃及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诉求，但在科文和马勒特的坚决反对下终于作罢。⁵

而布伦特则游走于英埃之间，继续发挥着沟通消息和居中调解的作用，试图以一己之力平息危机，促成英埃的和解与友善。2月，在殖民官员、大金融家和商人的影响下，英国已有大量媒体发出对埃及采取果断、强硬行动的呼吁。⁶为了澄清事实，反抗主战力量，27日，布伦特从埃及启程回国，以劝说格莱斯顿等内阁官员，并试图通过发表新闻评论来影响英国舆论。⁷

总的来说，在四月埃及军队内乱及其引发的内政危机到来之前，英国内阁的中间派仍偏向容忍现状和采取不干预的态度。比如，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愿意考虑与埃及议会进行谈判和协商，甚至认为可以通过支持民族运动和立宪改革来提升英国的影响力。⁸而后来极力推动军事干预的张伯伦在此时亦保持着温和态度，他指责联合备忘录的发布，认为内阁的信息并不足以判定埃及发生了革命，乌拉比等人的诉求是民族情绪的合理表达和对赫迪夫专制统治的正当反抗，备忘录的警告只会适得其反。对待埃及民族运动的正确方式是“引导而非镇压”，他建议考虑与民族主义者协商和妥协。

¹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p. 112-114.

² Mulligan, "Decision for Empire", p. 105.

³ Ibid., p. 107.

⁴ "Will they give up the claim of the Chamber to vote the Budget?" I told him that I feared it was hopeless to expect this, as the Deputies were all of one mind. 'Then,' he said, 'I look upon their case as hopeless. It must end by their being put down by force.'"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69.

⁵ "A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Granville indicated his readiness to re-open the discussion on the question of how far the Egyptians could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country." Schölch, "The 'Men on the Spot' and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p.781.

⁶ Buchanan,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and the Political Press, 1882," pp. 108-111.

⁷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56.

⁸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06.

但就扩张派而言，自从二月立宪触犯英法总监对埃及财政的垄断权力，且民族主义者拒绝让步以来，以科文为首的英国殖民官员便展开了歪曲乌拉比等民族主义者形象、渲染埃及失序以鼓动英国政府干预的强悍攻势，他们要求武力镇压乌拉比运动，甚至直接占领埃及。¹

当然，科文为英国武力干预寻找的理由并不限于个人控制权受到的威胁，还上升到了更普遍的公共利益和更高的国家利益层面。首先，埃及议会对财政收支审议权的诉求意在最终摆脱外国监管，而这将置大量英国债券持有者的财产于危险境地。²其次，埃及及其所据的苏伊士运河是英帝国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它沟通着欧洲和印度，以及更广阔的东方世界，英国绝不能让乌拉比运动威胁到埃及稳定和运河航行自由，更不能任由民族政府夺去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³

为了促使格莱斯顿政府采取行动，科文利用自己《波美公报》驻埃及记者的身份，向英国国内塑造乌拉比实施军事独裁、不得人心的暴徒形象，⁴渲染埃及政局的纷争无序及其对英国人财产和安全的威胁，称事态已没有内部解决的可能，⁵以便使内阁意见和公共舆论偏向发动军事干预。此外，科文还向图菲克暗示英国将坚决捍卫其权力和地位，鼓动他强硬对抗乌拉比等人，最好是将局面激化，以便为英国提供武力干预的理由。

在科文的劝诱下，马勒特也逐渐转变态度，并通过格兰维尔，充当起科文向内阁发声的传话筒。⁶此前，他自信借助布伦特的调解足以掌控局面，平息危机，但英法备忘录的发布及其在埃及激发的变局，却打破了他的预想。1月20日，他在给格兰维尔的信中警告，埃及议会的计划无异于发起一场革命。⁷2月，他向格兰维尔明确表示，自己对埃及民族主义者怀有偏见（“I am prejudiced against the Nationalists”）。在他看来，乌拉比等人已变成“危险的叛乱者(dangerous opponents)”，他们意欲摆脱英法的影响，而这严重威胁到埃及的稳定。如果英国对埃及事态放任自流而不趁早干预，局面只会不断恶化。⁸不过，相比于科文，马勒特还不主张英国直接介入，而强调应由土耳其出面。⁹布伦特认为，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51-152.

² “(The Chamber) was certainly disposed to eliminate the European elem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Iacolucci, *Finance and Empire*, p. 31.

³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 132.

⁴ 比如，称乌拉比武力胁迫埃及议长苏丹帕夏(Sultan Pasha)弹劾沙里夫内阁，以使其下台。但苏丹向布伦特戳破了这个谣言，称自己与乌拉比互相信任，存在共识。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63.

⁵ “The state of things admits no local remedy”. Halvorson, “Prestige, Prudence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1882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29.

⁶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54-155.

⁷ “The Chamber’s intention formed only part of a complete scheme of revolution.” Halvorson, “Prestige, Prudence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1882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29.

⁸ Galbraith and Afa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76.

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75-176.

到 3 月底，以科文和马勒特为代表的在埃官员操控着英国媒体和外交部门的意见，干预声势占据了舆论的上风。¹

尽管如此，直到四月埃及军队内乱前，英国内阁仍然没有就对埃行动达成一致，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反对军事行动和占领埃及。诺斯布鲁克等人则表现出对埃和解的意向，希望通过支持民族运动和立宪改革的方式，间接扩大英国的影响。而哈廷顿则是内阁中唯一以领土扩张为目的，主张英国单独军事行动的主战派。迪尔克评论道，哈廷顿处在孤军奋战中，面对其他阁员的一致反对。²

而四月埃及军队内乱及其导致的政治纷争则为扩张派提供了口实。在扩张派更激烈有力的攻势之下，摇摆的中间派逐渐倒向扩张派，而自由主义者们则在这些外在压力下开始让步，甚至涌动起内在的变化。

埃及军中暗杀乌拉比未遂事件发生后，马勒特完全认同了科文的看法，并利用自己对格兰维尔的影响力，向内阁渲染乌拉比的残暴与不得人心、埃及政局的混乱以及社会的恐怖氛围，劝说英国政府采取强硬行动。格兰维尔本考虑重新与乌拉比等人就立宪一事进行谈判，但马勒特和科文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³

5 月中旬，马勒特向图菲克担保，一旦冲突发生，英法会向其提供可靠支持，从而怂恿赫迪夫激化与乌拉比等人的矛盾，以倒逼英国内阁采取行动。为了消除格兰维尔的顾虑，他声称埃及并没有民族运动，而只有乌拉比欲发起的军事暴政(military despotism)。因此，干预危机是为了解放埃及人。⁴

迪尔克和哈廷顿则在英国政府内部发挥影响，以促动内阁作出强硬回应。迪尔克告诉格兰维尔，乌拉比被前任赫迪夫伊斯梅尔收买，因而他出于个人私利，企图推翻图菲克，以帮助前者复辟。⁵哈廷顿则自 1881 年 9 月以来，始终以帝国扩张和地缘政治竞争为由，坚持着主战立场，而在科文和马勒特等埃及前线官员营造的舆论支持下，他对军事行动的诉求更难以辩驳。于是，哈廷顿和迪尔克与科文和马勒特里应外合，对埃及发起军事行动的主张愈发难以抵挡。

5 月 13 日，格莱斯顿向试探内阁态度的布伦特回信，表示具体情况无法告知，让他等候格兰维尔将在周一发表的政策声明。自己所能给予他的唯一保证是，自由党的政策理应会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⁶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56.

² “At the cabinet today, Hartington made a great fight with all his colleagues, who were unanimous against him, in favor of French-Engl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Mulligan, “Decision for Empire”, pp. 106-107.

³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90-194.

⁴ Schölch, “Men on the Spot”, pp. 782-783.

⁵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68.

⁶ “Liberal policy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liberal doctrines.” Ibid., p. 203.

而布伦特等来的回应是：5月15日，格兰维尔在对埃政策上重申备忘录的立场，表明英国将坚持捍卫赫迪夫的权力和威望，反对任何对现存秩序的挑战。¹言下之意，英国已决心遏制乌拉比等人的威胁，更进一步的干预行动已提上日程。

由此，自由主义者们放弃了对沟通和调解的坚持，选择向强力干预的主张让步，接受了出动英法联合舰队示威的决定。5月20日，西摩尔率英国地中海舰队开抵亚历山大港。23日，格兰维尔授权马勒特在紧急情况下，可凭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行事（“act as he thought fit”）。两天后，马勒特自称受埃及议长苏丹帕夏(Sultan Pasha)委托，向埃及政府发出要求乌拉比辞职(retirement)、现任内阁下台的最后通牒。²

在此期间，英国铁甲舰矗立在亚历山大港，将埃及人逼向命运抉择的关口。

那么，格莱斯顿政府为何没有克制干预的步伐，而是迈出了武力行动的第一步？自由主义者们的坚持是如何瓦解的？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06.

² *Ibid.*, pp. 217-219.

第三节 英国政策走向：限于威慑的英法联合舰队

(一) 扩张派的攻势与自由派的让步

承上所述，可以看到，身在埃及当地的英国官员的主张和行动，对埃及局势和英国决策的走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索尔奇的研究正是重点关注这群人对出兵决策的影响，他将其称为“在埃及的当事人 (Men on the spot)”。这些人主要由英国在埃及的外交官和殖民官员组成，前者以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勒特为代表，而后者则以英国财政总监科文为代表。¹出于维护个人权势和声望，²或保有投资收益的直接目的，³他们表现出相对果断而不妥协的干预态度。由于具有获取和传播信息、影响或直接参与埃及内部事务的行动优势，这群人很大程度上把控着事态的走向，操纵着英国内阁决策的节奏。

财政总监科文正是在乌拉比等人拒绝让步，坚决要求议会分享预算审议权，从而冲击到自身权势后，才下定决心要发动帝国力量来推翻埃及民族政府。⁴马勒特则在军队造成埃及政局动乱，深感一己之力已无法掌控埃及秩序，自身威望和权势面临严重威胁时，最终决定镇压民族主义者，而不再考虑与之和解。

为了达成目的，两人分别利用对大众媒体和内阁信源的影响力，⁵塑造乌拉比是不得人心的军事独裁者的形象(“Urabi standing alone intimidating them all”)，让人以为赫迪夫才是众望所归。⁶而埃及正处在混乱和暴力的笼罩下，当地人面临着严峻的生命和财产威胁。

同时，他们也在行动上直接干预埃及的内部事务，从而将冲突激化。四月埃及军队内乱后，马勒特鼓动赫迪夫强硬对抗乌拉比等人的诉求，不要签署流放叛乱者的法令，暗示英法将出动舰队为他提供支持。⁷而由此导致的危机升级，又为他向国内渲染埃及危在旦夕，证明干预已不可避免提供了依据。

¹ 布伦特对科文的评价：“He was a typical Anglo-Indian official, strong, self-reliant, hard, with the tradition of methods long practised in India, but which were still new to our European diplomacy, endowed with just enough sympathy with Oriental character to make use of it, without loving it, for English purposes; but cold in manner and unattractive.”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51.

² 作为英方财政总监，科文享有对埃及至少半数财政的直接控制权，并握有对 1300 多名在埃欧洲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和财权(发放薪酬)。而马勒特作为在埃及的总领事，则希望能控制好埃及局势，以便于自己在英国外交界的长远发展。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 133 页。

³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56, 213.

⁴ *Ibid.*, pp. 151-152.

⁵ 科文与《波美公报》主编和持有者约翰·莫利(John Morley)有密切私交，是深受其信任的驻埃记者，而《波美公报》则是格莱斯顿最常阅读的报纸。马勒特作为驻埃及总领事，与格兰维尔保持密切通信，是后者的重要信息来源。

⁶ 马勒特称议会不支持乌拉比罢免赫迪夫的要求，但实际投票结果为 45:30，议会多数支持乌拉比的决定。*Ibid.*, pp. 222-223.

⁷ *Ibid.*, p. 216.

因此，在二月立宪和四月内乱期间，正是这群人将埃及危机激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击垮了自由主义者们的防线，从而使英国陷入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硬的干预之中。

正是由于索尔奇等学者注意到了这群人的存在，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经济解释便显现出了局限。“在埃当事人”视角折射出英国政治精英的分化，固然，经济利益的驱动能为少数人的主战立场提供很好的解释，但却不足以适用到全体政治精英层面，而其中的格莱斯顿内阁本身又是一个分化的群体，其间存在着超越经济利益的各种考量。

格莱斯顿等自由派在 1882 年 3-5 月间对爱尔兰危机的分神，则赠予了在埃及前线的英国官员施展拳脚的空间。在布伦特看来，解决爱尔兰问题是格莱斯顿首要的政治考虑，他将大量精力耗费在此而对同时发生的埃及危机关注不足。¹尤其是 5 月上旬，爱尔兰布政司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rster)辞职、卡文迪什伯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²被革命者暗杀等事件将爱尔兰危机推向高潮以来，格莱斯顿内阁甚至整个英国社会的注意力都被围绕爱尔兰事务的争论所占据，而深化中的埃及危机则被丢到了角落(“Egyptian affairs are put off as of no importance”)。³于是，科文和马勒特的信息和主张便缺少了制衡力量。

此外，爱尔兰局势的恶化也意味着主张对爱温和的格莱斯顿的失败。哈廷顿和迪尔克借机向其发出挑战，这动摇了格莱斯顿在对外政策上的威望和话语权。面对爱尔兰政策被推翻、内阁分裂甚至解散的风险，格莱斯顿选择在埃及问题上让步，以便维系内阁的凝聚，并争取重获对爱尔兰政策的主导权。⁴

格兰维尔则对埃及问题本就不那么热忱。自从甘必大下台，格兰维尔摆脱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法国压力之后，便不愿再花费精力充分了解有关埃及的信息，甚至对埃及前方来信置之不理，而把具体事务交给迪尔克打理。⁵

最后，自由主义者们的误判和自欺，则化解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抵抗和矛盾，促成了其最后的让步。在科文和马勒特的煽动和渲染下，4-5 月的内乱已使得埃及陷入军人篡位、秩序崩塌的危险境地，此时只有外部干预才能使埃及恢复稳定和自由，保障埃及和欧洲民众的安全。

¹ “The Irish question was priming everything in Mr. Gladstone's mind.”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188-189.

² 哈廷顿之兄，格莱斯顿的密友。Ibid., p. 201.

³ Ibid., p. 201

⁴ “He found himself out-voted, and Egypt, too, was thrown to the wolves.” “Look, his colleagues seem to have said to him, “where your policy of conciliation has led us in Ireland.” Ibid., p. 202.

⁵ Ibid., p. 163.

在这些信息的影响下，格莱斯顿已然完成了对干预行动的正当化，将其看作对失控(unruly)的民族运动的必要规约(remedy)。¹

5月15日，在上议院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格兰维尔否认埃及发生的是民族运动，而将其定性为军事叛乱和军人独裁。²此外，马勒特还使格兰维尔等人相信，英法舰队只需发挥威慑作用而不必实际动武，这种“温和”的方式足以震慑乌拉比等人，平息埃及乱局，实现不流血的胜利。³

而英国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与法国共同行动的方式，依然是出于英法关系考量的结果。在协商干预方案的过程中，法国强烈反对其他大国介入，尤其排斥土耳其出面，以免其趁机扩大在法属突尼斯甚至整个北非的影响。因此，法方尽管接受了英国对埃启动国际干预的诉求，但要求其方式只能是英法双边行动。⁴鉴于防范俾斯麦离间英法在欧洲和非洲协作的考虑，英国最终同意了法国的要求，将双方军舰开入亚历山大港——尽管某种程度上这不同于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将埃及危机国际化的预想。

对于自由主义者们来说，威慑而非动武，合作而非单边，总归还算是无需挣扎而只作让步的选择。

(二) 英法军舰示威的影响

英法军舰的侵入将埃及民族运动激向新的高潮。

武力威慑并未压服乌拉比和埃及人，在短暂的退让后，群情终于将乌拉比推举为了埃及“公认的领导者(the acknowledged master of the situation)”⁵。5月28日，恢复原职的乌拉比果断履行起国防大臣的职责，率领埃及人在亚历山大港周边修筑防御工事(“construction of earthwork fortifications and gun batteries in Alexandria”)，以抵御英法战舰的威胁。⁶而侵略者谋划的挫败和埃及内外矛盾的激化，则为6月的亚历山大港骚乱埋下了火种。

这些是扩张派乐见其成的，它使武力镇压和军事占领越来越成为英国唯一的选择。于是，埃及危机的深化拨动了英国启动新一轮干预的发条，自由主义者们被战争机器裹挟着往前；而恢复秩序、救赎文明的昭昭天命则终于使他们归化其间，并作一枚精良而顺滑的齿轮。

就这样，英法战舰载着全副武装的军队驶入尚未设防的亚历山大港，也载着埃及和英国驶向反抗与镇压的新循环——直至英军的登陆与埃及的陷落，将这场循环终结。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222-223.

²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1880-1885*, p. 30.

³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17.

⁴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1880-1885*, p. 33.

⁵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24.

⁶ *Ibid.*, p. 213.

第三章 从武力威慑到发动战争：1882. 5-7

第一节 埃及局势失控：亚历山大港骚乱与港口战备

5月20日，英法联合舰队开抵亚历山大港。次日，作为国防大臣的乌拉比召集武装，带领4000名预备军到港口对峙，并派炮手将英法舰队包围。英埃陷入直接军事对峙的局面。¹

在军舰的震慑下，25日，英法向埃及政府下达最后通牒，明确要求乌拉比撤职，现任内阁下台。埃及总理巴鲁迪强烈谴责英法的侵犯行径，但迫于压力终于解散内阁，乌拉比也随之去职。²然而，英法的武力威慑和赫迪夫的软弱妥协，却刺激了来自埃及军队、立宪派和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激烈反抗，他们一致向赫迪夫施压，使得乌拉比仅在一天内就恢复了国防大臣的职位。

事已至此，英法非但没能通过军事威慑镇压乌拉比势力，重夺对埃及的主导权，反而愈发巩固了后者的声势和地位，相比于坚决果敢的乌拉比，图菲克则显得软弱而自私。团结在乌拉比周围，埃及民族主义者们决意捍卫改革成果，并谋求废黜图菲克，以除英法渗透的楔子。

由于军舰威慑未果，英法转而促动土耳其出面调解。6月8日，土耳其代表德维什(Dervish Pasha)到达亚历山大城，迎接他的是声势浩荡的抗议浪潮。亚历山大城街上的小孩高呼：“最后通牒，最后通牒！(Note! Note!)”临街窗口的妇女则探身回应：“拒绝，拒绝！(Reject! Reject!)”³埃及议员则向德维什提交了分别由10000名和90000名埃及民众署名的请愿书，前者要求废黜图菲克，后者则要求拒绝英法最后通牒，保留乌拉比在政府的职位。⁴

甫一登陆，德维什便已了然埃及民情的趋向，深知乌拉比的让步难以实现。于是，他既没有接受民族主义者的请愿，也没有向图菲克作出捍卫其地位的承诺，而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折射出土耳其不愿被卷入埃及斗争的心态，暗示着此后英国让土耳其代为出兵设想的落空。出于这些原因，德维什的调解方案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对英埃矛盾的重提而非真正化解：土耳其原则上支持埃及的独立和安全，只要乌拉比辞职并前往土耳其面见苏丹，就可以担保英法军舰撤出港口。乌拉比则以两个条件作为回应：只要埃及的独立和安全已经得到保障，并且自己受到的不实指控和罪名得以撤销，就可以接受。毕竟，前者属于国防大臣的职责，后者则关乎个人的尊严。⁵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19.

²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p. 119-120.

³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38.

⁴ *Ibid.*, pp. 248-250.

⁵ *Ibid.*, p. 234.

僵持不下中，布伦特从在埃及的亲信处得知，乌拉比此时已得到军队、议会和大学的一致支持，埃及人正决意废黜图菲克，切断英法控制埃及内政的源头。乌拉比称，只要马勒特和科文依然在埃及发挥影响，埃及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于是，他回绝了土耳其的提议，决定把改革和自主的诉求坚持到底，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¹

6月11日，一场“偶然事件”把六月初以来的冷战局面点燃，将长时间的僵持推向冲突的爆发。

当天上午，亚历山大城的一个马耳他人拒绝向埃及男孩支付其驴子的租金，并在争执中将后者杀害。旁观的埃及人向马耳他人报复，而这又将希腊商贩和意大利店主引入到争斗中。²由此，一场私人纠纷扩散为大规模暴力冲突，直至上升为埃及人和欧洲人的对抗，并以250名埃及人和50名欧洲人丧生告终。³

但事实上，亚历山大骚乱并非偶然，而是矛盾的长期积累和少数人加以激化的结果。作为埃及对外交往重要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城居住着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和马耳他人内的大量外国人，他们既享受特权又在文化上与埃及本地人格格不入，双方关系长期紧张。而市长奥马尔·卢特菲(Omar Lutfi)并未试图缓解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反而对其加以利用。作为切尔克斯人，卢特菲反对埃及民族运动对切尔克斯势力的打压，在四月军变中站在乌拉比的对立面。6月11日，当亚历山大城的冲突还局限在小规模时，他故意拖延下达对警卫的指示，从而任由事态发酵和激化，以便按照此前与图菲克的盘算，为乌拉比制造麻烦，向英法提供武力干涉的事由。⁴

与此同时，马勒特和科文迅速与图菲克建立联系，向英国渲染埃及的混乱局面，警告埃及出现无政府状态和军事暴政的威胁，并劝说英国政府武力镇压煽动暴动和引发乱局的乌拉比势力。⁵

但实际上，正是乌拉比派军队平息骚乱，恢复了亚历山大城的秩序和安全。甚至当地的欧洲人也肯定乌拉比的称职，与埃及人一道公认他为埃及唯一的守护者(their only protector)。⁶在布伦特看来，乌拉比原本经由这次事件提高了声望，但可惜的是，他没能抓住机会及时斥责和惩罚敌对力量，宣示自己才是埃及真正的主导者(master)，从而让马勒特和科文等人抓住抹黑的由头，占据了在英国的舆论主动权。⁷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245-246.

²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23页。

³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 241.

⁴ 6月5日，图菲克向卢特菲传电报，表示乌拉比现声势已大，很可能成为埃及的主导者，让他在乌拉比和自己之间选边站。图菲克暗示卢特菲，如果乌拉比掌权，则其地位难保，而如果自己掌权，则会升其为国防大臣。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237-238.

⁵ *Ibid.*, pp. 239-240

⁶ *Ibid.*, p. 259.

⁷ Buchanan,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and the Political Press, 1882*, pp. 4, 64.

由此，亚历山大骚乱变成了英国扩张派与自由派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在埃及乱局的想象中，英国国内笼罩在惩奸除恶、恢复正义的好战氛围下，武力行动已箭在弦上。

另一方面，在英法军舰的持久威慑下，乌拉比继续主持着亚历山大港防御工事的修筑。英方以威胁军舰安全为由，要求拆除港口附近的军事设施，乌拉比未予接受。

直到7月7日，英国舰队统帅西摩尔已做好轰炸港口的准备时，埃及人终于选择了让步。乌拉比命令停止修筑工事，并允许西摩尔挪动军舰，任其自由选择其停靠位置(allow Seymour to move his ships away and choose his own distance)。¹他再次承诺维护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安全和埃及秩序，保证偿还国际债务和履行国际义务。²

此时，乌拉比希望避免战争，然而和解的机会已不再，格莱斯顿内阁反战的自由主义者们不仅被外界压服，也已经完成了自我说服。

7月20日，赫迪夫正式罢免乌拉比。两天后，赫迪夫将乌拉比认定为叛乱者，第一次正式割离开自身与乌拉比阵营，划分出一道正义与奸恶的界线。³

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出动陆军镇压“埃及军队叛乱”。7月24日，英国下议院以275票比21票的绝对多数，向征埃英军颁发了最后一张通行证。

而格莱斯顿内阁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然心安理得，义正辞严。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78.

²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 143.

³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 Khedive publicly and formally dissociated himself from Urabi. The Khedive had, finally, satisfied himself that the British were determined to suppress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bid.*, p. 130.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转变：正义而合法的军事行动

承上所述，军舰威慑的失败促使英国政府面临新的抉择。

到6月初，受马勒特等人消息影响的格莱斯顿已彻底转变了对乌拉比的印象，他称乌拉比卸下了民族解放的面具，而暴露出推翻图菲克，篡夺权位的真实意图。但由于仍不愿接受武力行动的选项，他和格兰维尔转而寻求埃及宗主国土耳其的调解，寄希望于德维什的访埃之行。¹但如前所述，德维什代表的土耳其缺乏干预埃及危机的利益关切，更不愿被卷入到英法、图菲克和乌拉比的政治斗争中，从而表现出一种圆滑应付的态度，并未对缓和埃及局势起到实质帮助。

6月11日，亚历山大骚乱发生后，在英国驻埃殖民官员和国内媒体的渲染下，埃及危机首次显现出全国规模的关注度，它所牵涉的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私利，而是全部英国人的安全和尊严。于是，长期拖延的埃及问题终于被提上日程，成为格莱斯顿内阁必须果断应对的问题。

而自由主义者们转变立场，内阁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改变的节点也正在于此。

骚乱发生后，格莱斯顿仍不愿英国单独实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于是他将亚历山大骚乱定性为“偶然事件”。²但在舆论对埃及乱局和乌拉比暴徒形象的渲染下，他的立场已经出现明显松动，表明英国对埃政策的目的是维护在埃及的传统权利和既有秩序，其实现方案则是与法国合作或国际协调。³事态发展到6月中旬，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明确表示乌拉比已不再值得信任，其存在不再与既存秩序相容。但是，断然采取武力行动却会给埃及秩序和当地欧洲人的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英国单独发起战争更缺乏正当理由。⁴

6月14日，面对哈廷顿等人以保护苏伊士运河为由而要求出兵的压力，格莱斯顿在下院辩论中重申，苏伊士运河对英国来说并没有那般重要，因为开普航线起着替代作用。等候欧洲协调和共同行动，或让土耳其出兵干预，仍是现下最理想的方案。⁵但实际上，格莱斯顿的发言已经暗示着，如果欧洲协调未能达成行动共识，或土耳其拒绝代为出兵，那么英国单方面的武力干涉则已经在他的考虑范围内。⁶毕竟，为了捍卫自由、法治和秩序的战斗，并不违背自由主义者的原则，它甚至是一份正义对抗邪恶、文明引导野蛮的责任。

而6月23日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则宣告了联合行动或土耳其出兵方案的失败。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希望与乌拉比和解，认同其在埃及的地位。会议还通过一项反对任何国家占领埃及或者对埃及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225-227.

²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 160.

³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24页。

⁴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07.

⁵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 126.

⁶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16.

谋取特权的决议。土耳其则直接没有参会，未接受向埃及出兵的动议。次日，法国向英国拒绝共同出兵以保卫运河安全的提议，英国愈发怀疑其暗自与乌拉比达成利益交换的谋图。¹

英国既已下定与乌拉比对抗的决心，当欧洲协调、土耳其出面干预和英法合作的预想都无法实现后，便只剩下了单独行动的选项。但对于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来说，他们的目标仍限于镇压乌拉比势力，平息埃及乱局的根源，而非借此实施领土扩张。正因如此，两人在没有提交内阁讨论的情况下，便直接回绝了土耳其苏丹割让埃及给英国的提议。²

7月5日，由于理想方案的落空和果断行动的必要，格莱斯顿最终同意了对埃及发起军事行动的提议，批准让西摩尔轰炸亚历山大港的命令。但他仍坚持反对哈廷顿和张伯伦要求占领苏伊士运河和埃及的主张。³无论如何，为埃及恢复秩序而非帝国扩张，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

正是守着这条原则，格莱斯顿等自由主义者们牢牢抓住了说服他人和自我说服的论据。7月6日，格兰维尔如此解释内阁轰炸亚历山大港的决策：乌拉比的武装行动威胁到了英国停泊军舰的安全，英国需要采取措施自卫。同时，事已至此，只有果断有力的武力行动才能彻底消除乌拉比等人军事暴政和违抗国际义务的威胁。⁴7月7日，当乌拉比终于妥协，停止沿港口修筑防御工事后，格兰维尔则表达了无法展开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失望。⁵

7月11日，在西摩尔的推动下，英军轰炸亚历山大港的行动终于发生。格莱斯顿再次以自卫和抗击军事暴政的说辞为英国政府辩护。⁶当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伙伴，布莱特因武力行动违背道义原则愤而辞职后，格莱斯顿亦以此为由劝解他，称轰炸港口是为了消灭军事暴政的威胁，纯粹出于自卫，并且英军行动将干脆利落，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企图。⁷因此，轰炸行动反而是对国际法和道德原则(moral law)的伸张，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由主义原则。⁸

而向港口开火之后，进一步增派陆军镇压乌拉比势力便只是顺水推舟。英国驶向埃及的战车已经不可抵挡。

¹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25-26页。

²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18.

³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p. 128-129.

⁴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19.

⁵ Newsinger, "Liberal Imperialism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p. 65.

⁶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27页。

⁷ "Egypt was governed by 'sheer military violence'. All legitimate authority had been put down. 'The British fleet, lawfully present in the waters of Alexandria, had the right and duty of self-defence.'"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1882," p. 244.

⁸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83.

7月22日，格莱斯顿内阁决定派遣远征军与乌拉比作战。23日，法国总理弗朗西内最终表示不参与英国的军事行动。¹24日，格莱斯顿的下院演讲为他的对埃政策作了最圆满的注解：一方面，军事独裁者乌拉比导致的冲突和动乱已无法靠埃及内部的谈判和妥协来平息，而只能依靠外部干预。另一方面，欧洲协调、土耳其出面干预和英法联合行动的尝试均已宣告失败。因此，在和平调解和多边行动已经行不通的条件下，英国只能单独实施武力干预，而此举不是为了帝国扩张，而是为了镇压暴政、恢复埃及的法治和自由，是帮助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实现和平、繁荣和幸福。²

“我始终在为和平而奔波着。”³回顾在埃及危机中的经历，格莱斯顿如是评价自己。

在上院，格兰维尔则从更现实的层面论证了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确信除开武力行动，已无法平息埃及危机。而各大国虽没有给予英国正式授意(formal mandates)，但他自信能得到他们的善意、祝福和道德支持。⁴英国出兵后，格兰维尔向其他大国发出照会，阐明英国的理由和目标，承诺英军不会在埃及驻留，更不会实施占领。⁵

而在扩张派这一边，自从亚历山大骚乱后，这些人基本把控了局势，掌握着话语和行动的主动权。

比如，马勒特和科文继续发挥在信息和媒介上的优势，通过私人通信和新闻报道向国内渲染埃及乱局，歪曲乌拉比的言行。他们让格兰维尔认为，亚历山大骚乱是由乌拉比等人有意策划的，乌拉比试图通过迅速平息乱局，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有能力统治埃及的人，从而赢得欧洲列强的认可，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⁶

迪尔克则极力向内阁渲染亚历山大骚乱给欧洲人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的威胁，以及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尊严和威望的践踏，认为这预示着不干预政策的告终。⁷凭借与张伯伦的私交，迪尔克不仅使张伯伦本人在亚历山大骚乱后彻底转变态度，积极鼓动内阁向埃及出兵，也帮助他自己受邀参与内阁会议，从而得以直接劝说或逼迫格莱斯顿等人，要求英国果断出兵。⁸

¹ C.J.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 48.

² Yıldızeli Begüm, “An Analysis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1882) Through the Lens of Victorian Party Politics,” *Turk J Hist*, Issue 69, 2019, p. 128.

³ “If it had struck a blow at the reign of violence and advanced the Egyptian question towards a permanent and peaceful solution, he would ‘feel that in being a party to this work, I have been a laborer in the cause of peace.’”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1882,” p. 244.

⁴ “Granville confirmed that there was no remedy to the situation without the application of force. The Powers would not give formal mandates, but Granville was convinced of ‘their good will, their good wishes’ and ‘their moral support’.” Halvorson, “Prestige, Prudence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1882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38.

⁵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p. 45.

⁶ 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p. 122.

⁷ *Ibid.*, p. 124.

⁸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15.

此外，作为外交部官员，迪尔克也具备着行动上的优势，而格兰维尔对埃及事务的淡漠，更使其掌控了执行的主动权。6月末，法国总理弗朗西内向格兰维尔提议废黜图菲克，考虑与乌拉比谈判和解。虽然出于种种考虑，格兰维尔决定拒绝法国建议，但却没有立即送出回信。而当他打算修改回信内容时，却发现迪尔克已在7月3日晚派密使将回信作为公文送出，¹从而终结了与法国共同行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

迪尔克甚至替自由主义者们考虑着出兵陈辞，建议表明英国政府并非反对民族运动，而是反对“乌拉比式”的民族运动。²他还要内阁警惕，避免将债券持有人等少部分人的利益作为出兵的理由，而应以恢复埃及秩序，保护苏伊士运河即印度航线的安全，抵制亚历山大屠杀等公共考量，来证明出兵的正当性。³

印度大臣哈廷顿则保持着强烈主张出兵的一贯态度。在事态的激化和迪尔克的帮助下，他在内阁中终于不再势单力薄，而获得了张伯伦、诺斯布鲁克和金伯利伯爵(1st Earl of Kimberley, 本名 John Wodehouse)等人的支持，他们向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施压，要求采取更强硬大胆的(bolder policy)政策，保护苏伊士运河，即英印帝国的动脉和国际贸易通道的安全。⁴哈廷顿反对自由主义者为英国施加的包袱，主张英国不应被英法关系和欧洲协调的原则所束缚，为了英帝国的现实利益，自由行动会是更好的选择。⁵7月，在轰炸亚历山大港前，哈廷顿直接向格莱斯顿透露了占领甚至吞并埃及的打算。⁶

而内阁的中间派，如曾对埃及民族运动抱有同情的张伯伦，或曾建议观望乌拉比改革的诺斯布鲁克，此时也倒向了采取武力行动的立场，与扩张派一同向格莱斯顿等人施压。

亚历山大骚乱之后，张伯伦最终转变了态度，认为此事让英国干涉再无法避免(“Alexandria riot now made intervention inevitable”),⁷由此站在了哈廷顿一边。6月中旬，由于持续的埃及危机扰乱了英埃贸易，英格兰北部工业城镇抗议英国政府对埃政策的优柔寡断。⁸张伯伦便以舆论为据向格莱斯顿等人施压，要求政府向埃及发动战争，“整个舆论界都希望英国发动战争解决埃及危机，我们要顺应这种要求”。⁹7月，张伯伦自信已将格莱斯顿逼到了墙角，他不得不接受对埃及的战争。¹⁰布莱特向布伦特透露，西摩尔在向亚历山大港开火前，曾向伦敦请示行动指令，但其请求一度被内阁拒绝。正是张

¹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p. 236.

² Martin Thomas and Richard Toye, “Arguing about Intervention: A Comparison of British and French Rhetoric Surrounding the 1882 and 1956 Invasions of Egyp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8, No. 4, 2015, p. 1090.

³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19.

⁴ *Ibid.*, pp. 111-115.

⁵ *Ibid.*, p. 123.

⁶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77.

⁷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09.

⁸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55.

⁹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103页。

¹⁰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77.

伯伦执意如此，内阁才最终授权了西摩尔的行动。¹但张伯伦终究不同于以帝国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者哈廷顿，在回忆录中，他对出兵依然作出了自由主义式的辩解：“A Liberal government had the strongest moral obligation to secure to the Egyptian people the greatest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²

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亦与哈廷顿达成了共识，将运河安全问题摆到台面，要求政府向埃及发起军事行动。6月21日，他与哈廷顿在内阁会议上向格莱斯顿施压，警告埃及乱局将破坏苏伊士运河的自由与安全航行，这将给英印帝国和国际贸易带来巨大风险。³

而作为向亚历山大港开火的实际执行者，西摩尔则完成了使英国政府陷入战争的最后一推。在亚历山大骚乱中身亡的3名英国人中，其中之一正好是西摩尔的贴身侍从(body servant)，西摩尔曾发誓要为其复仇。⁴7月7日，当乌拉比等人终于妥协，同意停止修筑防御工事和解除港口武装，并保证承担国际义务后，西摩尔却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命令其率军投降(“the surrender of the forts”)⁵，而这一点让埃及方面无法接受。7月10日，西摩尔向格兰维尔报告乌拉比正整军备战，武装军械，若是不停手，便将自卫为由对其开火。⁶

7月11日，英军向亚历山大港开火，战争拉开了序幕。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83.

²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1882,” p. 241.

³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p. 114-115.

⁴ “Sir Beauchamp Seymour, who had sworn to be revenged on the Alexandrians for Lord Stanley of elderly, the death of his body-servant, a man of the name of Strackett, who had been killed in the riot.”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240-241.

⁵ Colleen Seymour, “The Bombardment of Alexandria: A Not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345, 1972, p. 794.

⁶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第26页。

第三节 英国政策走向：单独向埃及开战

(一) 自由主义者们的的外在压力

从观望到警告，再到武力威慑和国际调解，格莱斯顿内阁终于还是决定发动对埃及的战争。在局面僵持不下时，为何英国无法像法国一样，考虑放弃对既往格局的坚持，转而与乌拉比达成妥协？尤其是对内阁中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为什么不坚持和解的主张，而是和扩张派达成了出兵埃及，抵制到底的共识？

承前所述，自埃及危机之始，自由主义者们就面临着顽强的外在压力，在埃及的英国殖民官员、政府内部的帝国扩张派、金融和商业利益集团，都顽固地要求政府果断干预，镇压乌拉比对秩序的挑战。

而乌拉比等人刚强、不妥协的态度，以及赫迪夫与马勒特和科文等人的里应外合，则从埃及内部将危机不断激化，使克制有限的干预方案越来越难以施行。布伦特坦言，如果乌拉比在6月初妥协，承认图菲克在埃及的权威和地位，而不是坚持与赫迪夫和土耳其使者对峙，英法就不再具有正当的干预理由。¹但是，在冲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乌拉比却坚持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甚至威胁政治冲突将发展为一场宗教战争：“Let them send European, Turkish, or Indian troops, as long as I breathe I will defend my country; and when we are all dead they will possess a ruined country, and we shall have the glory of having died for our native land. Nor is this all. A religious war will succeed the political on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will fall on those who provoke.”²

亚历山大骚乱爆发后，乌拉比与赫迪夫、埃及人与外国人的矛盾发酵到新的深度，而扩张派则借机渲染舆论，使英国人相信乌拉比的军事独裁和埃及乱局再也无法容忍，必须即刻行动。6月21日，迪尔克评论道，英国下议院充斥着好战情绪，这些人受英国人在骚乱中被害的刺激，急切地想要杀人解恨，即便他们不知道报仇的对象是谁。³面对着席卷的舆论浪潮和内阁多数的压力，格莱斯顿等人只能在干预的路上一步步往前，而国际调解的失败、土耳其和法国对出兵的拒绝，使得英国单独发动战争成为镇压乌拉比，恢复旧秩序的唯一选择。

赫迪夫图菲克则应和着英国的计划。早在7月6日，图菲克便已获悉西摩尔轰炸港口的打算，他没有克制冲突，而是命令乌拉比做好战备，如果英国军舰开火，则以炮火回击，从而促使埃及军队将冲突扩大，为英国发动正式战争提供机会。⁴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247.

² *Ibid.*, p. 248.

³ “Our side in the Commons are very Jingo about Egypt. They badly want to kill someone. They don’t know who.”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09.

⁴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p. 287-288.

(二)自由主义的复杂性：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帝国

除开一贯的外在压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自由主义者们本身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并非完全被扩张派推着走,陷于不得不出兵的死角,而是主动捍卫着镇压乌拉比的决策,甚至也为武力行动辩护。在秩序与文明的托辞下,自由主义者们由被动妥协到主动宣扬的转变,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当乌拉比成为自由的敌人后,自由主义者们便很自然地转为要求镇压乌拉比势力。而英国遭遇到乌拉比的暴力抵抗,从而验证了乌拉比的险恶形象后,使用武力便成为正当的自卫。从军事震慑,到武力镇压,自由主义者们一步步地说服自己。

对于自由派的代表格莱斯顿来说,要接纳单独出兵的决策,需要迈过自由国际主义在其心理上设置的两道障碍。一是,如何化解干涉埃及内政直至出兵的行动与不侵略他国的原则之间的矛盾?二是,如何化解英国单边武力行动与大国一致原则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了这两个自由主义设下的心理束缚,自由派就可以完成最终的转变,主动甘愿而非被迫屈从地向埃及发动战争。

对于第一个思想障碍,自由派作出了以下化解:一是将乌拉比等“叛乱分子”与埃及国家或埃及政府区分开来,于是,出兵埃及便非但不是对某个主权国家实施侵略和领土扩张,反而是帮助其镇压某群造反者。“Gladstone achieved some wriggle-room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ilitary action to remove ‘any obstruction’, which he approved, and ‘a plan for occupying the Canal’, which he opposed.”¹

二是将作为手段的战争与作为目的的和平区分开来,于是,英国发动的战争是实现善意目的的手段,它是为了埃及更持久的和平和更长远的发展。“长痛不如短痛”,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不讲条件的和平主义者。

对于第二个思想障碍,自由派则如此化解:一方面,国际调解和共同行动的方案已在几番努力后证明行不通。另一方面,英国作为负有重任的文明大国,决不能因为他国不支援而放弃行动,而是更需要单独承担使命,帮助埃及走出危局,将其拉回秩序和文明的轨道。因此单独发动战争虽然无奈,但是必须主动去做。具体而言,这两个障碍在1882年6-7月间是如此在自由主义思想内部得到解决的:

首先,自由主义者们让自己相信,对埃及内政的武力干预,即镇压乌拉比运动符合自由主义原则,这一点通过重新诠释乌拉比的形象来完成。亚历山大骚乱后,乌拉比最终被刻画为个人野心膨胀的军事独裁者,而非为埃及利益考虑的民族主义者。正是他煽动了民众的反叛和仇外情绪,造成了埃及政局的动乱和欧埃之间的冲突。因此,埃及发生的不是自由主义者应该理解和同情的民族运动,而是军事叛乱,乌拉比正试图施行与立宪政府对立的军事独裁。英国非但不能旁观,反而得发动国际干预,以捍卫埃及的秩序和独立,以及自由主义和立宪政府在埃及的萌芽。7月24日,格莱斯顿为出兵埃及

¹ Mulligan, “Decisions for Empire,” p. 116.

所作的下院演讲，鲜明地表露出这套逻辑：“Our purpose will be to put down tyranny and to favor law and freedom; and we shall cherish something of the hope that it may yet be given to Egypt, with all her resources, and with the many excellent qualities of her peaceful and peace-loving and laborious people, to achieve in the future, less, perhaps, of glory, but yet possibly more happiness than she did once achieve, when, in far-off and almost forgotten time, she was the wonder of the ancient world.”¹

其次，自由主义者们让自己相信，英国发动对埃及的战争，即以单边武力行动来镇压乌拉比运动的形式是正当的。到 1882 年 6 月底，事态已使外部武力行动成为必需的选择，“Only violence ruled in Egypt since every legitimate authority had been put down.”而被寄予希望的君士坦丁堡会议未能通过各国联合向埃及出兵的提议，土耳其代为出兵或英法联合出兵的方案也都先后落空。

同时，面对乌拉比对英法舰队设防的武装威胁，格莱斯顿可以称向亚历山大港开火只是出于自卫，并非主动挑起侵略。“Gladstone went on to explain that Great Britain had been forced to defend its fleet when the nationalists built fortifications and refused to tear them down.”²

而西摩尔的开火则使事态发酵到最后阶段。在面临出兵的抉择时，自由主义者们将战争设想为速战速决、目标有限的军事行动，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同时，战争也绝不出于帝国扩张的目的，不会导致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只是为了恢复埃及的秩序、法治和自由。这是一场为了自由的镇压，为了和平的战争，是文明对抗野蛮的正义行动。³

因此，单独战争行动不仅不违背自由主义原则，反而是对其在现实条件下的践行，只不过这种捍卫自由主义的方式更加曲折复杂，也需要更强的决心和责任感。

但内阁中另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布莱特，却并不接受格莱斯顿等人的说辞，在西摩尔向亚历山大港开火，议会决定对埃及出兵后愤而辞职。格莱斯顿与布莱特的反差揭示了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多面性和在实践中的复杂性。对于布莱特来说，无论如何，和平而非动武，包容而非偏狭，都是更靠近自由主义理想的选择。布莱特坚守着自由主义宽怀谅解的一面，当其遭遇现实处境的冲击时，则选择超脱政治以作原则的保全。

格莱斯顿却不是从一而终的理想主义者，而是穿梭在现实与理想世界之间的政治家。即使遭遇价值原则与现实条件的矛盾，他也总能融贯出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名的说辞，以此展开正当的行动。“If he

¹ “Egypt: Gladstone’s Defence of Government Policy, House of Commons,” 24 July 1882, *Hansard*, 3rd series, CCLXXII, Cols. 1576-90. 转引自: Begüm, “An Analysis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1882) Through the Lens of Victorian Party Politics,” p. 128.

²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p. 43.

³ 马勒特对格兰维尔的劝解: “It has been a struggl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1882.9) Galbraith and Afa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478.

had a new distasteful policy to pursue, his first object was to persuade himself into a belief that it was really congenial to him.”¹

布伦特感慨，有两个“格莱斯顿”同时存在着，一个是私下的，一个是公开的。前者对埃及民族运动抱有无限的善意和同情，后者则是对公众玩弄把戏的机会主义者。²

当然，格莱斯顿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融贯的矛盾。一方面，格莱斯顿等自由主义者的欧洲中心观，孕育着民族自决与普世价值，世界构想与国家中心，国际和平与正义战争之间的内在冲突。因为自由主义是以英国的经验和理想，来规定秩序、进步、幸福和文明的普世意义。于是埃及本身的诉求与理想便处在与之冲突的地位，在“我”与“他”的划分中，民族与普世、国家与世界成为了对抗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正是借助欧洲中心的偏狭视角，自由主义者才能在现实行动中无视这一矛盾，站在秩序平定动乱、文明引导野蛮的高点上，发动对埃及民族运动的镇压和对埃及的军事占领，以及对它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而将自由主义在价值上无差别赋予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关爱，抛在余光之外。而干预一旦成为文明的责任，战争便自然正义。在这种种观念和原则的裂缝之间，潜藏着的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巨大的解释空间。

7月24日，英国下议院以275票对2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对埃及的战争决议和军费预算。⁴

7月29日，法国议会则以417票对45票否决了总理弗朗西内向埃及出兵的计划。⁵德国和奥地利则态度模糊，对英国的行动既不支持，也不反对。8月2日，俄国拒绝出兵。⁶至此，英国单独出兵埃及成为定局。

9月，英军胜利，乌拉比被逮捕。消息传到伦敦，格莱斯顿欢欣鼓舞，欲鸣炮敲钟以表庆祝，并要求绞杀乌拉比，在布莱特的极力劝说下才作罢。⁷

12月，英军占领埃及后，张伯伦却在给布莱特的信中怀疑，内阁当初对埃及局势的研判是否准确？是否因为内阁在关键时刻讨论不足，而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⁸

¹ Blu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 181.

² Ibid, pp. 180-181.

⁴ Newsinger, “Liberal Imperialism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p. 68.

⁵ Hammonds,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p.40.

⁶ Halvorson, “Prestige, Prudence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1882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p.439.

⁷ Newsinger, “Liberal Imperialism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p. 69.

⁸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p. 242.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为干预和出兵的主要反对者，自由主义者对强硬干涉主张从压制，到退让，最终转而主动捍卫的过程，基本可以看作英国政府从不干预到口头警告，再到武力威慑，直至单独出兵的对埃政策调整的另一面。而这种调整之所以会不断发生，或者说自由派之所以会不断转变立场，总的来说可从自由主义者承受的外部压力和怀有的内在动力两个方面来解释，即扩张派的强大攻势和自由派的软弱和矛盾。此前，罗宾逊的战略解释或霍普金斯的经济解释都更多是从扩张派的角度着眼，这些解释可以回答这部分人为何主张果断干预埃及事务，发动对埃及的战争和占领，但却不够关注内阁自由派的抵抗和克制。换言之，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不足以解释为何格莱斯顿等自由派愿意接受甚至支持战争，因而也不能在英国政府整体的层面上，对出兵作出解释。

因此，本文回归到埃及事态发展和英国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完整过程，并以自由派立场和主张的转变为焦点，以便在借鉴和融贯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出兵作出更完整的解释。一方面，扩张派具有坚定的决心和清晰的目标，并通过联合法国、控制信源、引导舆论和率先行动等手段，掌握了对埃及事务的控制权。另一方面，自由派既在策略上缺乏可靠的替代方案和果断的执行力，又在思想上存在矛盾，其欧洲中心的自由主义本身便为扩张预留了空间。

格莱斯顿政府发起的对埃扩张意味着自由主义在对外政策上的挫败。于是，1870年代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对帝国路线的激烈争论已成往事，从此，自由党和保守党在对外政策上日渐趋同。⁷

让人慨叹的是，正是自由主义者格莱斯顿，完成了协调帝国现实利益与自由国际秩序的论证，用自由主义话语辩护了以英国利益为中心的对外扩张的正当性。⁸因而，自由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并非不兼容的身份。在这一点上，格莱斯顿对英帝国作出了比迪斯雷利更深远的贡献。

如何看待格莱斯顿等自由主义者对英帝国发展的影响？如何认识自由主义秩序中，道义与利益，思想与实践，国际主义与国家中心的矛盾？对于前者，自由主义者们本一心反对干预埃及事务，但却为了一纸自由贸易协定迈出了英国干涉的第一步；本反对使用武力，但却在关键时刻为出兵镇压埃及民族运动辩护；本想就埃及乱局速战速决，却最终让英国在埃及站稳了脚跟，进而向非洲南部挺进。对于后者，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持续争斗，启动国际干涉的基础和限度是什么，西方文明在“异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都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的思考与实践遗留给今天的问题。

⁷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pp. 51.

⁸ Thomas and Toye, "Arguing about Intervention: A Comparison of British and French Rhetoric Surrounding the 1882 and 1956 Invasions of Egypt," pp. 1091-1092, 1111.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 [1] 安德鲁·波特:《欧洲帝国主义,1860-1914》,叶海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2]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 [3] 沈秋欢:《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4] 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刘玉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 [5] 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文论文:

- [1] 王娜:《格莱斯顿与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 [2] 叶亢:《舆论是这样制造的——对埃及阿拉比事件中英国报刊“舆论一致”现象的研究(1881-18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4年5月。

英文著作:

- [1] Blunt, Wilfrid,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Being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Events*, New York: A.A. Knopf, 1922.
- [2] Cain, Peter and Antony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3] Eldridge, C. C., *England's Mission: The Imperial Idea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Disraeli 1868-1880*,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3.
- [4] Lowe, C.J.,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 [5] Robinson, Ronald, et al.,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Second edi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 [6] Swartz, Marvin, *The Politic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Disraeli and Gladston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5.

英文期刊:

- [1] Begüm, Yıldızeli, "An Analysis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1882) Through the Lens of Victorian Party Politics," *Turk J Hist*, Issue 69, 2019, pp. 113-134.
- [2] Chamberlain, Muriel,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Decision Making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abinet,"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 No. 3, 1976, pp. 231-245.
- [3] Chamberlain, Muriel, "The Alexandria Massacre of 11 June 1882 and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1, 1977, pp. 14-39.
- [4] Galbraith, John and Afaf Lutfi al-Sayyid-Marsot,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Another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9, No. 4, 1978, pp. 471-488.
- [5] Halvorson, Dan, "Prestige, Prudence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1882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56, No.3,2010. pp. 423-440.
- [6] Hopkins, Antony, "The Victorians and Afric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1882,"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7, No. 2, 1986, pp. 363-391.
- [7] Huffaker, Shauna, "Representations of Ahmed Urabi: Hegemony, Imperialism, and the British Press, 1881-1882," *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 Vol. 45, No. 4, 2012, pp. 375-405.
- [8] Mowat, Robert, "From Liberalism to Imperialism: The Case of Egypt 1875-1887,"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6, No. 1, 1973, pp. 109-124.
- [9] Mulligan, William, "Decisions for Empire: Revisiting the 1882 Occupation of Egypt,"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CXXXV No. 572, 2020, pp. 94-126.
- [10] Newsinger, John, "Liberal Imperialism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Race and Class*, Vol.49, No.3, 2007, pp. 54-75.
- [11] Pinfari, Marco, "The Unmaking of a Patriot: Anti-Arab Prejudice in the British Attitude Towards the Urabi Revolt (1882),"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2, 2012, pp. 92-108.
- [12] Schölch, Alexander, "The 'Men on the Spot' and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9, No. 3, 1976, pp. 773-785.
- [13] Seymour, Colleen, "The Bombardment of Alexandria: A Not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345, 1972, pp. 790-794.

- [14]Steiner, Zara, “Reviewed Work(s): 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 by D. C. M. Plat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3, No. 3, 1970, pp. 545-552.
- [15]Thomas, Martin and Richard Toye, “Arguing about Intervention: A Comparison of British and French Rhetoric Surrounding the 1882 and 1956 Invasions of Egyp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58, No. 4, 2015, pp. 1081-1113.

英文论文:

- [1] Buchanan, Dona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 and the Political Press, 1882*, Master dissertation, Texas Tech University University, 1997.
- [2] El-Magrahi, Milad,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and Egyptian Nationalist Respon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2.
- [3] Hammonds, Nancy, *Gladstone, Egypt, and the Sudan, 1880-1885*, Master dissertation, North Texas State University, 1975.
- [4] Iacolucci, Paul, *Finance and Empire: 'Gentlemanly Capitalism' in Britain's Occupation of Egypt*, Master dissertatio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4.

版权所有

致谢

我想我可能是不太喜欢写论文的，它要人带着目的提问，追求清晰确定的应答。从寻找好奇、规范问题，到检索材料、准备论据，直到组织逻辑章法、排列言辞与格式，这像是一场漫长的劳作，我老希冀着它终于了结的那天。而一个写“致谢”的机会，则像论文承诺的诱人奖赏，隐隐骚动在我心中：不同于论文，致谢可以很感性，流露出人的激情和冲动；可以很含糊，不需要什么推理和断语；可以很自我，用不着瞻前顾后，强求与他人同频对话。尤其是当一篇致谢紧随在论文之后出现时，那种轻对重，放对收，日常对反思，诙谐对严肃的反差——实在太抓人啦！

以上大概是我几个月前的想法。坦白讲，实际投入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后，此前的一番预想并非全没道理，完成一篇小文章的使命，在一两百天的日子里，总是在各种事务后如影随形，让人没个安稳。不过，当针对论文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成为这段日子的习惯后，我也体验到了静下心来，精雕慢琢一件工艺品的乐趣。这件工艺品或许没多大美感，可至少在我眼里，它总还不算太“走形”。

因此，我想感谢的第一件是：感谢写作毕业论文这段经历本身，它带我领略了一次严肃写作的流程和状貌，教我耐心与求实。相应地，也感谢全程参与这段经历的自己，谢谢你还能怀着好奇和决心去体验那些未知的事情——即使这未知终究会被磨得平常，甚至藏着艰苦，你也还是愿意去拥抱它。

可是，写作论文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因此，我想感谢的第二件是：感谢对我亦师亦友的梅然老师，是他带着我走完了选题及其细化，阅读文献，拟定结构，落笔写作及其修缮这场有关毕业论文的探险。如果没有他，就算我最后能摸爬滚打、颠颠簸簸着磨到终点，也会因曾半途迷路而丧失下一次启程的勇气。

毕业论文也不只关乎阅读和写作本身，拖延几个月的战线已将它化入了我生活的日常。因此，我想感谢的第三件是：感谢养育和陪伴我的父母。当我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钻研我的口味，投其所好地激发我的食欲——众所周知，食欲最终会转化为对生活的热爱。而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日复一日地给我分享新鲜的花草、肥美的食物和我可爱的小鸚鵡，即使我的回复往往很简短，老是一副端着端着的姿态。

我的日常里，当然还有我可爱的朋友们。因此，我想感谢的第四件是：谢谢和我同一屋檐下的室友们，谢谢你们陪我吃好睡好，让我成长为了早睡早起、足顿吃饭的好人。感谢我的好朋友瑶姐和小杨，谢谢你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陪我说废话，虽然这并不能把我变聪明，但却让我总是很快乐，或者至少是比较容易趋于快乐。我没有把将她们写进致谢的计划藏着掖着，只不过前者在一堆闪现的废话中直接无视了这条重磅通知；而后者则珍惜得多，“求我”一定不要因为她自己的毕业论文已提交答辩而一怒食言，郑重承诺把我写进她的硕士论文致谢——我认为这个交换条件很诱人。

我常觉得，思考和写作论文教我务实和理性，而小说、音乐和电影则教我做梦和想象，教我开放和包容。因此，我想感谢的第五件是：感谢小说、音乐和电影等诸如此类的精神生活，你们让我看到了“丰富”，又引导我需有坚守；让我体会激动和颤栗，又慰我以安定和从容。你们让我体验到了另一种爱的感觉。

在逻辑和经验之外，我还想感谢一位从天而降的豆瓣网友。谢谢你让我体验到了何为年轻和快乐的生活，谢谢你叫我觉得自己依然还有种种可能，谢谢你教我对无名的力量心怀感恩。

最后，感谢五六月的夏天，你让这个句号画得轻盈却饱满，为她抹上晚风与鸟语的味道。还要感谢命运，谢谢你赐我幸运——幸运得在说出这么多感谢之后，我还意犹未尽。

祝艺源

2022年5月23日午后 于燕园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查重网站: <https://co2.cnki.net/Main.html?dp=pku>

论文查重率: 0%

论文作者签名: 祝思源

日期: 2022年5月27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
- 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
-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 祝思源 导师签名: 梅强

日期: 2022年5月27日